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60 期

60

● 华民：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昭'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邀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作题为“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的发言，这是基金会举办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活动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乔依德、研究员肖明智等随后对此进行了讨论。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此次研讨会的实录。

华民先生认为，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在衰退。之前，中国经济有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邓小平的正确道路：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对内改革突破了供给约束。引进外资闭合了储蓄缺口，出口导向闭合了外汇缺口。

中国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错在不做出口，去搞贸易平衡，把整个增长体系全调换了。中国如何重返繁荣之路？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改革而非调整，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整会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造成价格扭曲，甚至可能产生更多的负激励。还有再加上“振兴出口”，因为没有出口，就没有投资，没有就业。同时，要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解决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贸易非对称

性问题，缩小贸易顺差，给别人挣钱机会，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挣钱机会。

与会者认为华民先生做了一个系统化的独立研究，但对其部分观点亦有不同看法。乔依德认为，国家的退税力度还是很大的，实际上还是鼓励出口的。工资增长并不都是因为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在增长，不大可能让工资不增长。费方域则认为，看上去是政策不鼓励出口，但实际上再鼓励，出口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其他成本更低国家的出口替代了我们的部分出口。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目 录

华民：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 1

提问与讨论..... 49

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4 年 11 月 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今天是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我们不定期地举行内部研讨，叫“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华民老师也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这次请他来，是因为上个星期在杭州开的“2014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论坛”，在闭幕式上，华民做主题演讲，当时时间较紧，只给了 15 分钟，比较匆忙，我觉得有点可惜。后来我就跟华民老师商量，请他来这里讲，这样时间上宽松一点，讲的自由度可以大一点。他还是先做一个引导性的发言，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下面就开始。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我把最近关注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交流，题目是“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

从这个题目来看，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在衰退。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新常态，还有一种就是衰退。如果我的观点不是衰退，就没有必要用这个题目了。首先引用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只有理解了经济变迁的过程，我们才能有效地建立经济变迁模型。”因此，大部分经济学

家都进入了大概率中。正确理解经济变迁、经济增长必须要认识现实的本质，希望我是在小概率中，而非大概率中。阿瑟·拉弗最近的书是写美国如何重返繁荣，他把奥巴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批评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是，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能够实现经济繁荣的政策必须与基本的人类行为相一致。（这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远比收入再分配政策重要。”一个是指经济学家在做什么，一个是指政府在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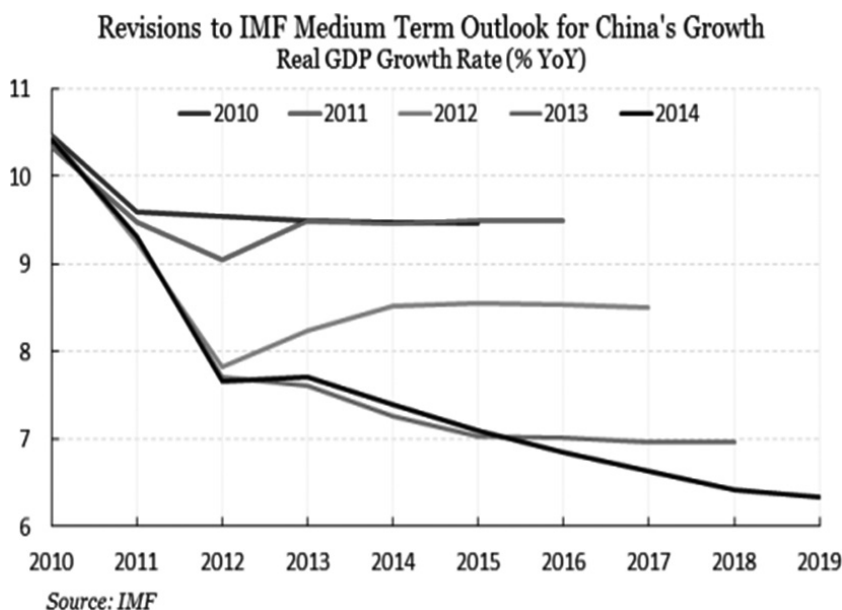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 GDP 增长率预测

统计数据比较悲观。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年的预测线。2011 年的预测是红线，2012 年的预测是绿线，

2013 年的预测是灰线，2014 年的预测更加不行了。该预测图基本上^①是外推预期，根据过去几年的表现来推导将来。观察经济增长率，2010 年以前有两位数的增长率，2015 年开始七都保不住了，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是衰退。

以下从几个角度来谈中国经济。第一，为什么会走向衰退？第二，面对衰退，我们如何使中国经济重新走上繁荣。

按照诺斯的观点，先得有一个对经济变迁过程的正确理解。我先把 1979 至 2003 年这段时间做一个简单总结。2004 年以前，我们所有的政策基本上都正确。这十年就是制度出错，激励出错，导致了激励衰退。1979 至 2003 年这段时间的政策是对的。我们采用一条正确的道路，成功闭合两缺口，进行了三大约束下的正确选择。中国近期高速增长，是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在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中，市场基本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与市场处于合作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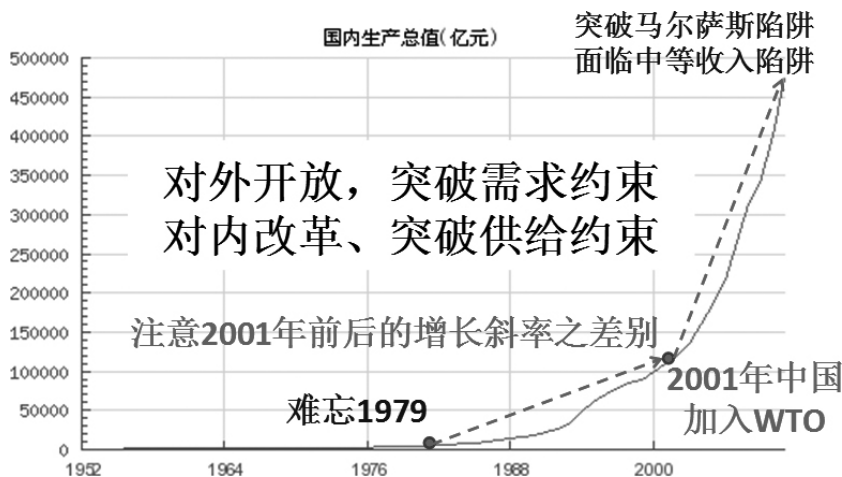


图 2：一条正确的道路

1979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拉出了一条长阳线。1979年至2001年的增长斜率为20至25度。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增长斜率基本上为70%多，直线往上增长。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为何会有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邓小平的正确道路：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对内改革突破了供给约束。对内改革就是准入，地方可以建乡镇企业，老百姓也可以自由创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人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保持这般增长，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我已经十年没有加过工资了，我一直跟别人说我就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的直感就是如此，十年没有加过一分钱工资。一个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肯定不会十年不加工资。

第二，成功闭合两大缺口。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有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这两大缺口。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引进外资闭合了储蓄缺口，出口导向闭合了外汇缺口。

第三，三大约束下的正确选择。三大约束为需求约束、供给约束、市场约束。第一个需求约束就是人口约束。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农民的占比过高，而不是经济学家所讲的储蓄率过高。经济学家天天喊储蓄率太高，总想释放储蓄来提升内需，其实不正确。1979年改革开放时，农民占总人口比重为79%；2006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占总人口比重49%；现在为47%，扣除流动人口后，至少35%以上为实际滞留在农村的农民。第二个约束是禀赋角

度的供给约束。中国的劳动供给以民工为主。邓小平解散农民公社，从而产生了剩余劳动，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力大量从农村向城市工业转移，但转移的劳动力是民工，而非产业工人。民工不可能从事发达工业和国家的高端制造，不可能从事技术，不可能从事研发，因此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选择是正确的。除非禀赋发生变化，否则任何调整结构的政策都不可行。第三个约束是市场约束，即市场均衡。如今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出口渠道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跨国 500 强公司中，50 年、100 年、150 年老字号经营基本坚持渠道为王。加工贸易成为中国无奈但又正确的选择。通过以上几点观察，如果给中国 1979 年至 2003 年的经济增长做一个理论总结，就是“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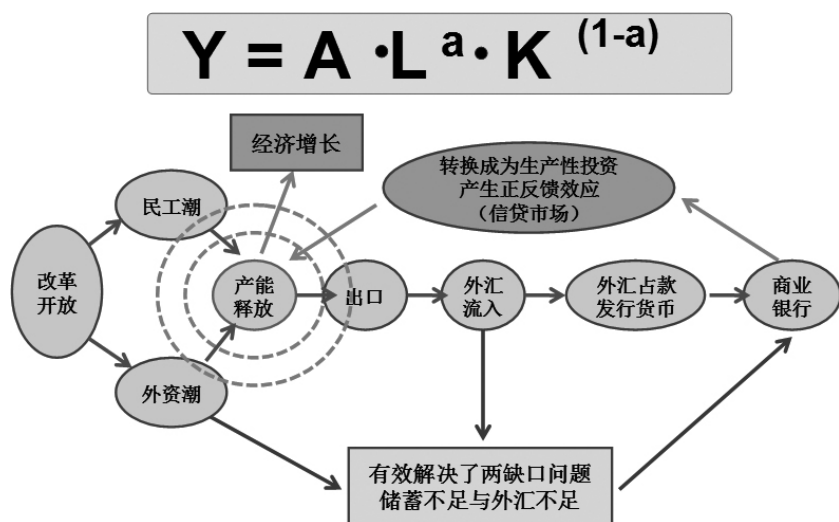


图 3：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

新古典增长的生产函数为标准的道格拉斯函数，由十亿农民工、三万亿美元 FDI、全要素生产的提高组成。全要素生产的提高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农民进城，从报酬递减的农业转移到了报酬递增的工业；第二是外资。外资引进后，产生了竞争溢出效应，中国的企业学走了很多先进技术。我把这个生产函数定义为“新古典增长”。新古典增长为什么依靠出口推动呢？就是前面给出的约束条件：产能释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释放了十亿农民工，产生了民工潮；引进了三万亿美金，产生了外资潮。外资潮和民工潮，促进了产能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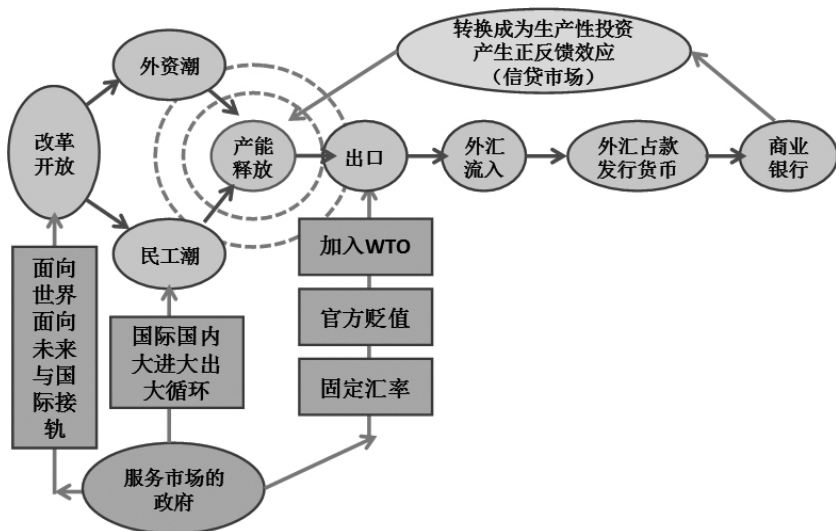


图 4：政府与市场的蜜月（1979-2003）

但在农村居民占比较高的国家，相对于释放的产能，内需是不足的，需要靠什么平衡呢？出口。产品出口以后，外

汇流入构成央行资产，并用外汇占款发行货币来平衡央行资产负债表。我国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占比长期较高，特别是最近，一直维持在 60% 至 65%。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了，到了商业银行进行信用创造，并通过信用创造转变为 M1、M2，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企业进行再投资，便可达到 GDP 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循环由此开始。在循环过程中，中国的两缺口，即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得以有效解决。这是基本经济增长的逻辑。

1979 年至 2003 年期间，政府在二十年中与市场基本上在蜜月中。期间经历三代政府。第一代邓小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第二代赵紫阳，国际国内、大进大出、大循环。第三代朱熔基。浮动汇率是用来应对资本流动的，不能应对贸易立国。贸易立国需要固定汇率，并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发现竞争力。由于竞争力不足，导致 1994 年官方汇率贬值。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三代政府基本上都是出口导向，这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并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促进出口，两者激励政绩。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在于激励的方向错误了。以上是我对 1979 年至 2003 年间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历史回顾，描述了其增长奇迹。

第二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何走向衰退的？首先是从贸易再平衡开始的。为了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采取刺激内需、人民币汇率升级和结构调整，寻求贸易再平衡。这先得讨论中国贸易为何如此，再观察解决贸易失衡的两种调整方法，最后提出中国的选择是正确或错误。本人的研究结果为中国的选择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衰退。

以下先谈中国的贸易失衡。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

差，欧洲和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家对中国贸易造成逆差。从需求、供给、制度三个视角观察，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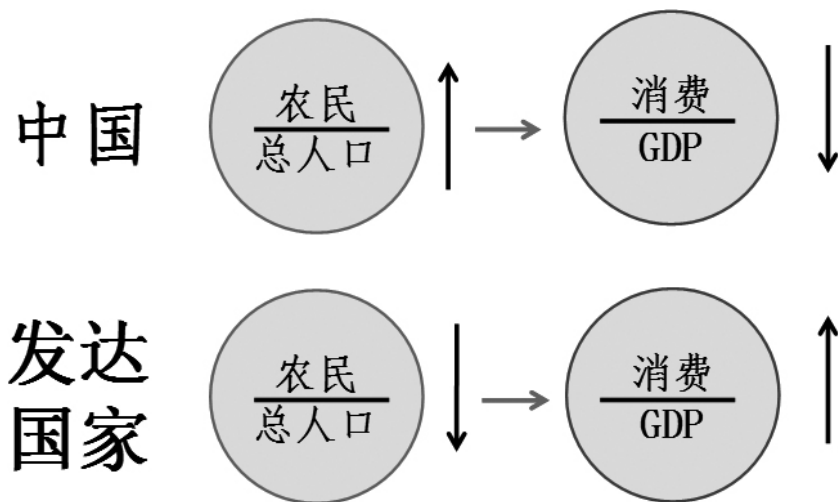


图 5：决定内需高低的主要因素（需求视角）

第一个视角，决定内需高度的主要因素就是农民占总人口比。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低，因为农村人口占比高；美国、欧洲、日本消费占 GDP 的比重高，因为农村人口占比基本上在 2% 至 4%。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往往建议官方刺激内需，这便犯了诺斯讲的“没看问题的本质，只看事实”的问题。没问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消费不足。因为农民。

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为什么缺乏内需呢？这是由农民和非工资劳动者人数决定的。第五列代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黄色（最下一层）指

farming，即农民；深绿（中间一层）指 self-employment；浅绿（最上一层）指挣工资者。东亚包括中国，挣工资者少，所以消费少。没有工资便没有消费，一定是依赖自我制造或自我雇佣。这是欧洲，再看拉美和加勒比。它们的农民数量较低，所以消费较高。

FIGURE 1 *A job does not always come with a w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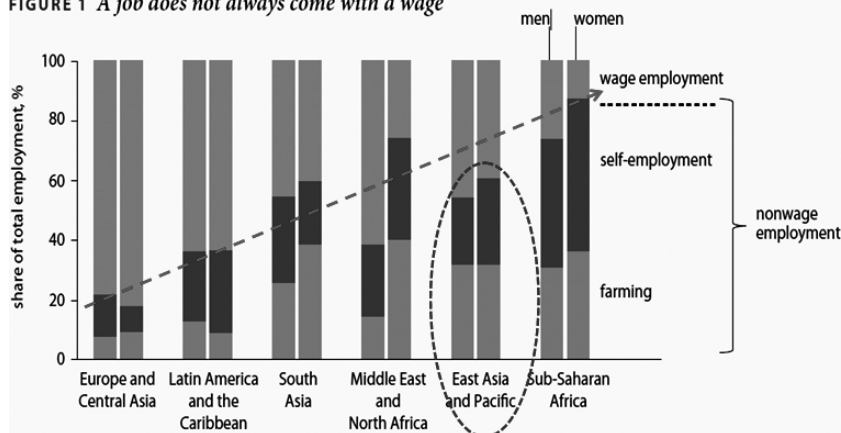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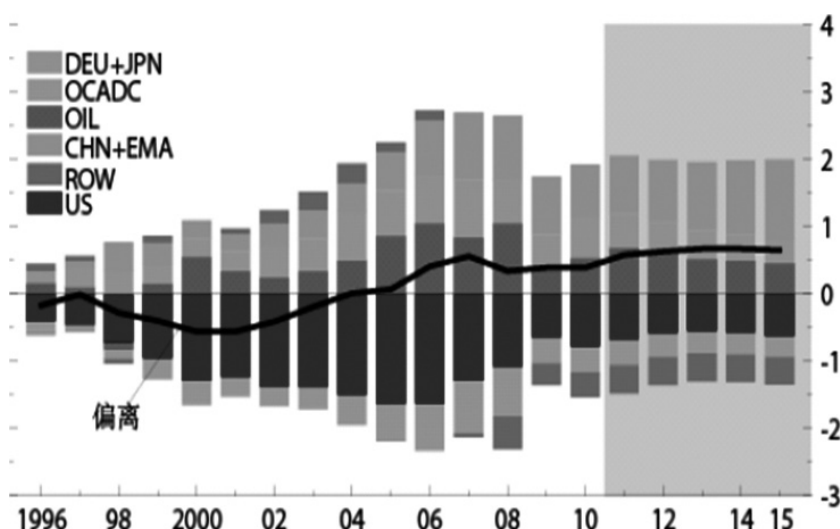


图 6：工资与职业的关系

我很欣赏这张图，统计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一个国家的消费状态由什么决定，这与政策无关，而与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有关。我国所有由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可惜的是，在前两天刚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中，总理将要采取六大刺激内需的政策，采用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这说明我国经济学家全都开错了药方。关键在于，增加内需要通过改变农民身份，使土地私有化并流转，配套户籍管理。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在做。如今正好与十八届三中全会背道而驰。从需求视角来概括，

国民不工作，国家便不可能富有；国民不工作，便没有收入去消费。

从供给的视角来说，为什么中国贸易顺差？制造业国家大都是贸易顺差国。根据我前面的观点，制造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产能必须足够大，一定是本地居民消费不了的。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¹CHN+EMA: 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和泰国；DEU+JPN: 德国和日本；OCADC: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OIL: 石油出口国；ROW: 世界其他地方；US: 美国。

图 7：制造业国家大都是贸易顺差国

观察统计数据，德国、日本、中国和东亚都是贸易顺差国。顺差国中除了石油出口国，其它都是制造业国家。黄色指日本和德国，粉色指中国和东亚，包括韩国和越南等。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除非不从事制造业，但不从事制造业，中国往哪里发展呢？受约束的条件是我国以农民为主，供给视角下是贸易顺差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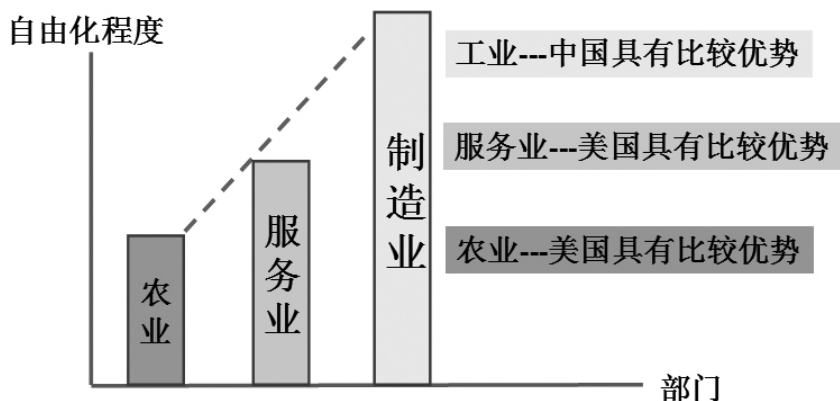


图 8：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化与贸易失衡

制度视角下，贸易自由化是不对称的。我把纵坐标定义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把横坐标分为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三个部门。制造业经过七个回合的协议谈判，从关贸总协定、WTO 到非关税壁垒协定。服务业和农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基本上较低，同时也是递减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具有优势，美国则为服务业和农业具有优势。结果造成有些不可以自由贸易，有些可以自由贸易。制造业可以自由贸易，在中美两国中，中国一定为贸易顺差。这是非对称性的，是结构问题，与汇率的确无关。我国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常说中国问题是汇率问题。其实，中国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为什么美国更加容易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逆差国家？因为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到全世界任何

地方基本上都受阻。为什么美国进行多哈回合谈判？因为受阻，所以采取自由贸易谈判。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也是同样的道理。否则，通过降低消费来平衡是很难做到的，美国有它的比较优势。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呢？如果出现结构性的贸易失衡，应该使用怎样的调整方法来解决？按照经济学上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结构性贸易失衡不能靠价格调整来实现平衡。价格可以解决总量问题，但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贸易失衡的结构调整方法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资产渠道，经常项顺差、资本项逆差；一种是商品渠道，制造业顺差了，服务业、农业开放了，贸易自由化也对称性开放。因此，贸易失衡是可以平衡的。如果我们不使用或者无法使用结构调整方法，还有两种价格调整方法。在调整国际收支资产表时，一种是德国模式，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调整；另一种是日本模式，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关键看本国企业是否具有出口竞争力。

接下来，我将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分析。第一，为什么用汇率来调整贸易顺差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而非数量，是不能用价格调整的。第二，在管理纸币本位的条件下，汇率调整是不可行的，因为汇率控制权在美国。在管理纸币本位的条件下，市场均衡汇率也是不存在的，市场其实总是在跟随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经济金融政策。我们总讲让市场决定汇率，我想问市场是跟随还是再决定。业内的说法、美国财政部长的讲话才决定市场均衡价。市场只是跟随，而非定价。

金本位崩溃以后，美国汇率出现波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策略很简单。1980年后美元升值，为什么对付拉美？

因为拉美对美元是负债。1985 年广场协议以后，美元贬值，让日本升值，为什么？因为日本的竞争力太强大。2001 年又出现美元贬值了，2002 年美国财长将强势美元变成弱势美元，为什么？因为 2001 年出现欧元，要对付欧元。2005 年以后，美元又贬值，强迫人民币升值。



图 9：美元指数

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不是市场来决定汇率。美元指数的高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定价，其实就是美元发生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说了算。用市场、用汇率来调整这个国际收支均衡，这是不靠谱的。我觉得特别是中国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顺差，绝对不能够依靠汇率来调整。

不能靠汇率来调整，其实发达国家都理解，只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理解。

全球汇率制度安排表中，发达经济体，准备做贸易的选择了固定汇率，有资本流动的选择了浮动汇率，汇率制度就是两个极端，这是完全固定，这是完全浮动。中间状态是什么？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要么是固定

汇率，要么是中间状态——有管理的浮动。想用有管理的浮动控制汇率的波动，又来平衡贸易，这是全做错了。中间制很不好，中间制会产生什么问题？比如 2005 年汇改的时候，所有人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 40%，但基本面不支持，于是正负 0.3%，有管理的浮动。结果人民币升值远期的议价消灭不了，投机资本就大量投。每天都来炒人民币外汇，一炒有顺差，2005 年到现在，升值了九年，单边升值。中间制是最坏的，因为中间制不能消灭远期外汇升值的议价，形成长期升值的预期，短期不断积累。中国国际收支表一天比一天坏，本来是通过价格调整来平衡国际收表，来降低贸易顺差的，结果贸易顺差没有控制住，使得短期资本下的套利大规模发生。所以我们汇率制度的安排是非常糟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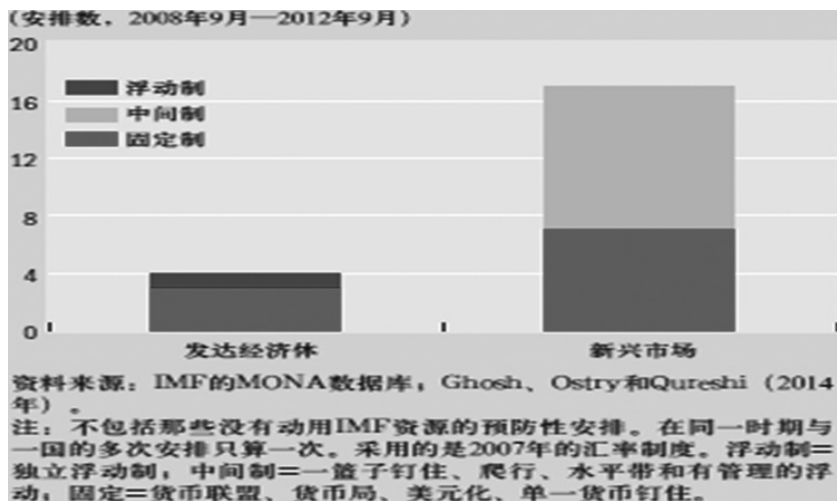


图 10：全球汇率制度安排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汇率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那

么无非两个选择，要么是完全固定，要么是完全浮动。对于资本流动的国家来说，浮动对付资本流动；对于做贸易的国家，完全固定。千万别选中间的状态。我们 2005 年选的中间状态就出现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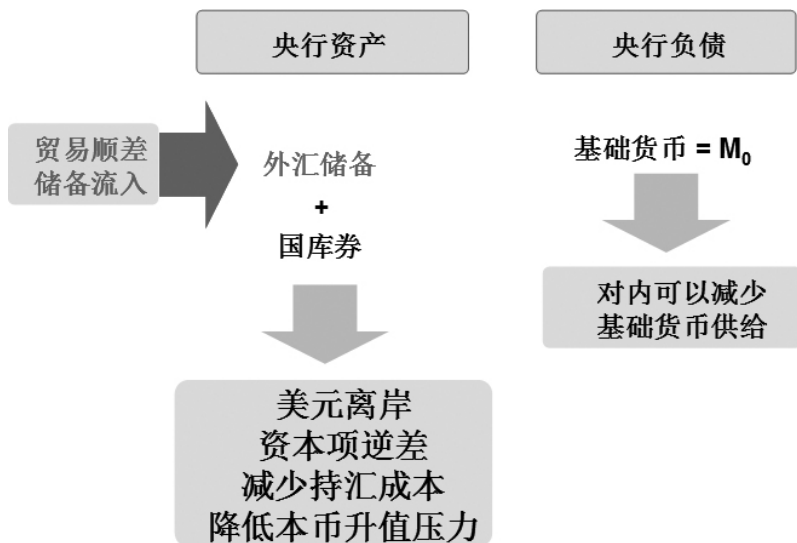


图 11：资产渠道调整

接下来讲结构渠道调整的方法。第一，资产渠道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贸易顺差流入了，通过资本项，美元离岸。这是一个平衡方法，这个平衡方法导致基础货币不变，不会通货膨胀。贸易经常项顺差，国际收支表不变，可以平衡。这对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既没有升值压力，货币也不会像固定汇率那样形成货币供应上因为外汇的正反调整。

第二，商品渠道调整。我用这个数字想反证一下，中国的商品渠道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商品渠道的调整应该开放服

务业开放和农业，让美元的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我们的工业也有比较优势，两个平衡一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就大幅的减少，国际收支表也比较平衡。怎么反证，1978至1993年，1993年至2004年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倍；但服务业减少了2/3，全要素生产率从2.7变成0.9；农业基本上没变。中国的农业和服务的开放率不够，竞争力不够。如果想从商品渠道平衡国际贸易，很简单，工业出口了你有竞争力，然后服务业进口，农业进口。农业和服务进口，把农业和服务业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他们全要素会提高的。现在1993到2004年，农业没变，服务于向下，说明没开放。商品渠道我们没调，资本渠道我们调不了，这两个渠道，结构调整没有做好。下面我来讲，你通过这两个渠道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不做这两个渠道的调整，也要学德国，德国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价格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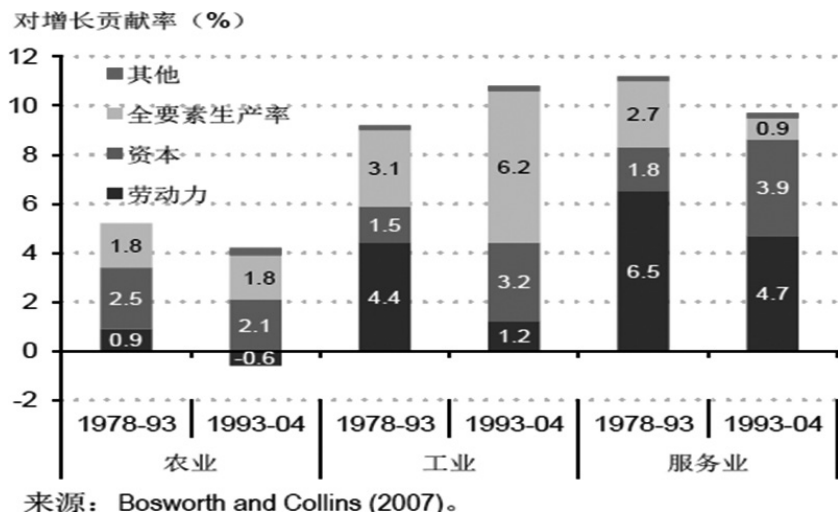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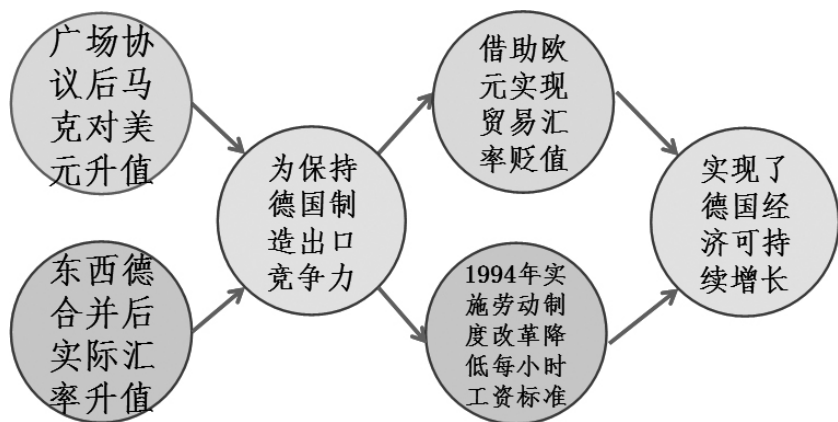


图 12：商品渠道调整



德国每小时工资标准下降后
德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
两者间的缺口靠提升生产率弥合

图 13：德国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价格调整

1985 年广场协议，马克和日元对美元都升值了。1989 年柏林墙倒了，东西德合并实际汇率是升值的。东西德一合并，东德的劳动生产率是西德的 1/6，但他们享受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法律，享受的是西德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名义汇率升值，德国竞争力在下降。为了保证德国的出口竞争力，德国做两了件事。第一件是实施劳动体制改革，降低每小时工资标准。我们每年在增加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他们在降低最低小时工资，而且每小时工资下降以后，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增长。小时工资在下降，收入在增长，中间靠什么来弥合呢？靠提升生产率。一个国家真正想富有，第一个要干活，第二个要提高生产力。这是德国给我们的第一个经验。

以下为第二个经验。1994 年，马斯特里条约签署了。2011 年进入欧元，贬值。德国人躲到穷人堆里，通过欧元

平价，让马克对美元贬值。没有欧元时，马克换 0.2 美金；有了欧元，2 马克换 1 欧元，1 欧元 2001 年换的是 0.84 美金。这是马克贬值的方式。所以它的名义汇率贬值了，实际汇率贬值了。因为德国有制造，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德国的收入分配是最均等的。没有制造业的国家，就没有生产力。香港就出了问题，没有制造，要么做地产，要么做金融，要么在街上卖报纸、扫地、出租车。今天香港出问题，就和这个经济结构是有关系的。经济结构在决定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这个社会阶层的结构。这是德国人的做法，我很欣赏。德国人真的太理性，做得太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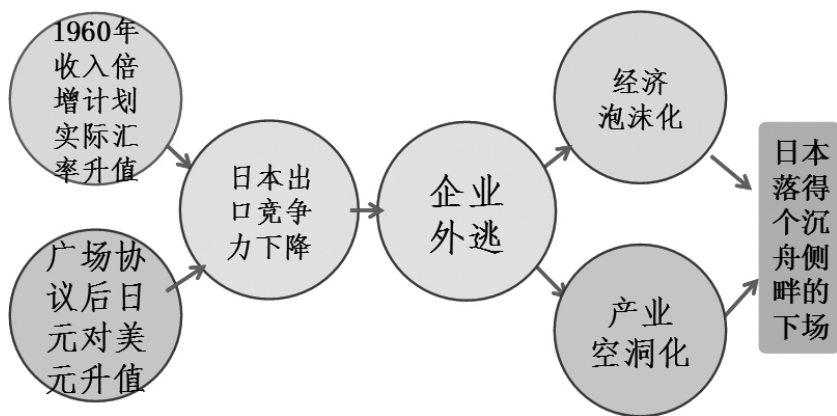


图 14：日本基于资产负债表的价格调整

你再看日本，日本是基于国际资产负债表。1960 年的收入倍增经济法，要搞收入倍增，不搞劳动生产率，不搞技术创新。广场协议后，名义汇率升值。因此，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不做任何的改观，听凭企业外逃，企业把经济转移出去，企业一外逃，产业空洞化、经济泡沫化，1989

年泡沫经济沉舟侧畔，怎么弄都没用了。因为日本的经济结构有问题，它的结构是不能够增长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下降，人口为什么负增长？日本全盛时期，一个蓝领工人年收入是 800 万日币，相当于五六十万人民币。现在企业外逃，找不到工作，一个蓝领年收入是 400 万，400 万的小伙子是找不到太太的，有 400 万的收入的姑娘不会嫁一个要养的男人，所以日本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不生育，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供给负增长。道格拉斯·诺斯说：“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人口数量决定了稀缺性，穷了就创造财富。一个是质量，质量决定你用什么方法来创造财富。日本现在的人口全没了。我们经常说日本有发明创造，日本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在企业。日本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都是企业做出来的，与英美不一样，英美都是大学教授做的出来。安倍怎么弄都没用，劳动力供给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大量的都是 **part time**，没有 **full time**。劳动供给都是 **part time**，都是小时工资，而不是全日制。没有全日制，制造业做不了。制造业 365 天流水线不停，每天八小时开工，日本人就愿意每天上班几小时，挣了钱飞到罗马吃饭，完了回来日本打打工，这种做法完全不支持日本的经济增长。基于资产负债表要让国际收支平衡的方法完全不成。德国是基于投入产出表，我必须要有制造，我必须要有就业，要有收入增长，要让德国企业能够盈利。同样是价格调整，日本的调整方法完全是错的。我们讲完了贸易顺差，国家有两种调整的方法，一种是资产渠道，一种是价格渠道。

接下来，从三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选择。第一个结构调整。资本项调整，美元离岸是受阻的，主权基金和国企面临制度的壁垒，你有政府背景，有党的背景，你到国际市场上

买不到任何东西。结果很多国企去了专制国家，那风险太高了，人家一场政变，几百亿的投资就没有了。民主国家你去吗？人家认为你是异质国家，因为你是非民主、非市场国家。主权基金和国企要进入国际市场，要让资本项走出去，基本上是面临着很高的壁垒。我们除了买美国国债还可以买什么？没东西可买。民营企业也出不去，民营企业第一借不到外汇，第二你技术达不到，双重的壁垒。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壁垒，根本做不了对外投资。有钱人出去了，裸官带着钱出去了，造成了资本和人才的双重流失。经常项，贸易自由化的受损，来自于既得利益，来自于服务业、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制约，导致中国不可能产生大农业，一定是细碎的小农经济，完全没有竞争力。所以农业不敢开，服务业不能开。因为服务业中存在既得利益集团，贸易自由化谈判便受阻。你想用经常项，通过贸易自由化来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是不可行的。

产品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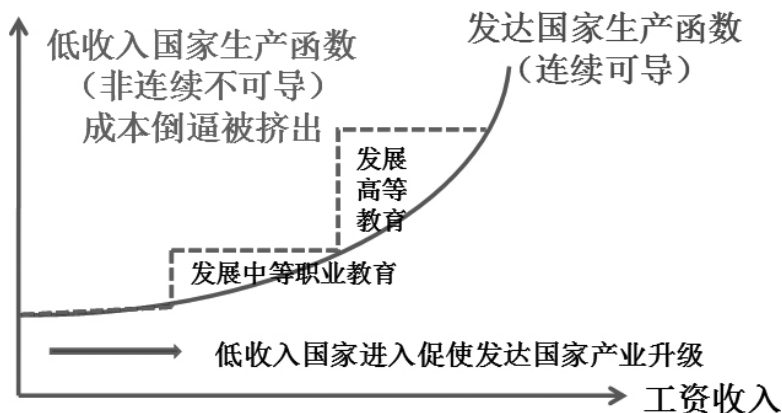


图 15：低收入国家为何不具备结构调整的条件

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我们因为两个正确的结构调整不能进行，就刺激内需和产业升级，不做外贸做内需。前者造成了总需求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不支持内需。后者造成了总货币下降，要素禀赋丧失了。

要素禀赋，这是工资收入、产品品质。发达国家高端和低端都做，等到低收入国家挤进来，我就把低端放弃，沿着连续可导函数做高端。我这里说的工资收入是真实地反应市场劳动力效率和技能的，随着工资收入水平提高，生产函数在增加。我这里说的工资收入是没有政府扭曲的。我们现在用政府扭曲把工资打上去，不算是生产力提高。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如果不发展中等教育，你到这里就结束了，中端做不了；如果你不发展高端教育，你到这里就结束了。你的生产函数是有拐点的，没有两个教育系统做支持，中国生产函数是不连续的。

一定要调结构就会造成什么结果？禀赋不支持的情况下投资下降、供给下降，结果发现制造业投资没有了，全都是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所以今天一看满街都是投资家和地产商，为什么没有企业家？因为生产函数不支持。很多经济学家就假定，中国生产函数也一样，倒逼，提高工资了，企业都做高端的，那就把企业逼死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生产函数的差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政策显然都是错的。最近十年刺激内需，推动消费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干掉总需求，外贸出口下降；一个干掉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下降，经济肯定是衰退的。整个逻辑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不支持出口，总需求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产生。从贸易的理论来讲，可贸易的商品本身就不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全世界都在你这儿炼

钢，如果我要去炼钢，我会选谁？为什么到中国就说产能过剩呢？这纯粹就是胡扯。这就是封闭经济体的思考，才有产能过剩的思考。当然中国另外的产能过剩就是制度，是国有企业干出来的，它确实是产能过剩的，因为它即没有产权激励又没有预算约束，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都乱了。市场不会产生产能过剩，把总需求压下去了，产能过剩就曝出来。现在银行坏账最高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江浙一带的企业坏账不断增长，本来好端端的制造业为什么现在突然不行了？因为没有出路，内地产能过剩，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提出产业升级。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受制于禀赋约束和生产函数不可连续，生产性固定资本便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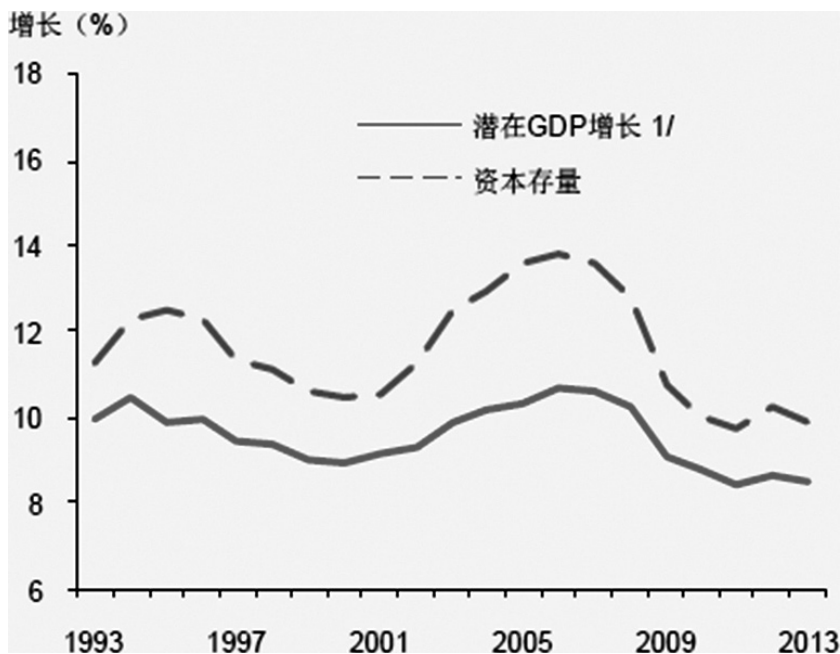


图 16：潜在 GDP 增长与资本存量

2013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破 10，潜在 GDP 破 8。今天不投资生产性固定资本，明年就没有经济增长。这个趋势从 2006 年以后就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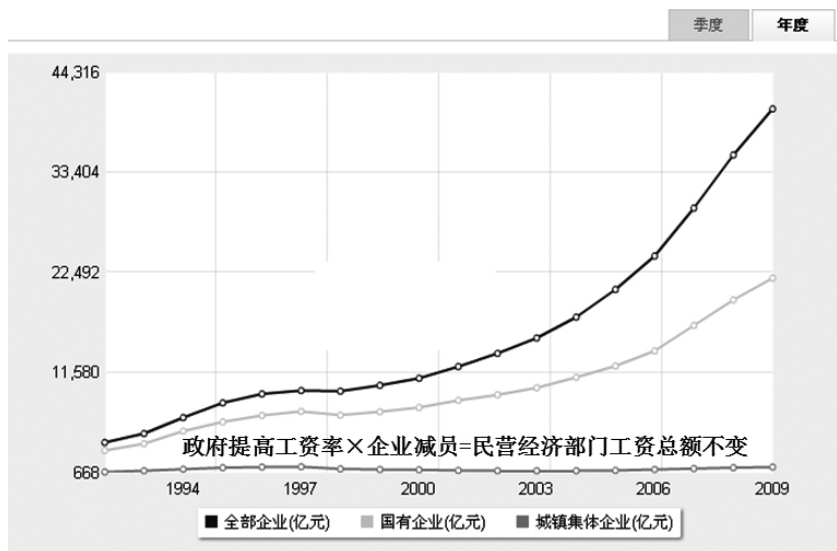


图 17：加工资导致失业增加不增加总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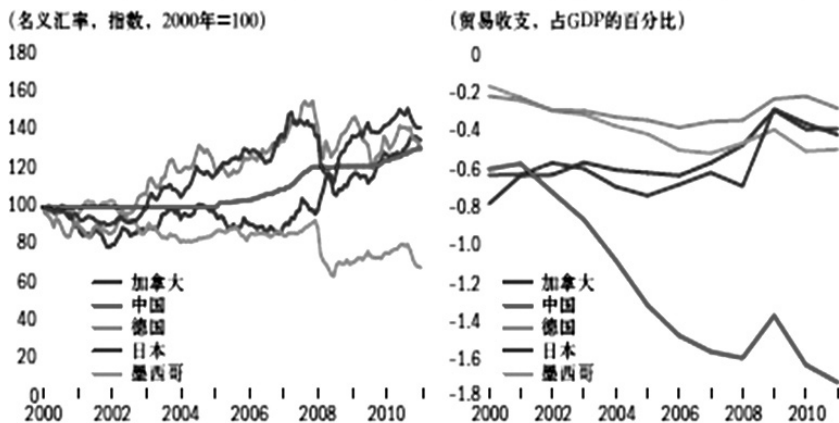
经济型基本常识是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提高工资也是提高产能；劳动生产率不变，提高工资就是提高成本。2004 年上届政府把工资提上去，想增加内需，2003 年和 2004 年基本上是一个拐点。全社会工资总额在增长，民营部门的工资总额是不变的，为什么？政府号召提高工资，企业减员，两个一乘，民营公司总的工资不变，增加的是失业，总需求在减少。最后工资加给谁了呢？工资不断地增加，第一个加给了是姓“公”的，第二个加给了姓“国”的。公务员、国有企业拿了钱做了两件事，第一买房子，第

二做投资。你到温州到什么地方一看，一个私人老板一跑路，背后有两三百公务员，买三套五套房子，完全没有进入到生产性资本的周转循环。加工资能够刺激内需，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犯的常识性错误，给政府开了那么多的药方，做了那么多的措施，结果中国的结构性调整是错误的。我们无法做正确的结构调整，就做了两个错误的结构调整来替代，即刺激内需和产业升级。

图2

弹性的重要性

汇率弹性非常重要，如美国双边汇率制的不同模式以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和信息公布系统（Information Notice System）数据库的估算。

图 18：人民币汇率升值与贸易收支高度负相关

贸易顺差还在扩张，怎么办？我们被迫做了价格调整。中国选择的价格调整方法，是基于资产负债表下的价格调整，不是德国的那种基于投入产出表以提高保护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主的价格调整。你要做价格调整，固定汇率不能用

了，变成浮动汇率，我们选了最不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远期议价无法消除，给国际资本提供了的套利机会，并产生人民币单边升值效应与热钱流入产生的外汇占款效应。这个外汇占款是这样来的，只要你汇率升值，出口增长下降，经济增长就结束。但结构性的问题没解决，顺差未能消除，而贸易增长率却在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下降。这是中国做了价格调整，选择了日本的模式，而不是德国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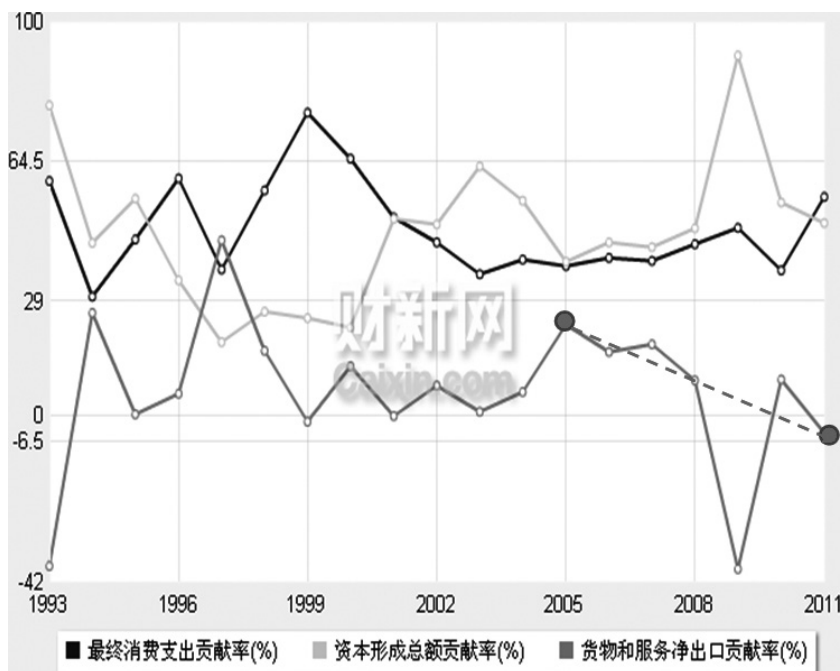


图 19：中国贸易增长率自 2005 年汇改后趋于下降

这是一些统计数据，自 2005 年起贸易增长一路下降。

1994 年起增长，之后有贬值，1998 年出现一个高点。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朱镕基政府把订单全部拿过来，1998 年出现高速增长。2001 年加入 WTO 一路上升。2005 年汇改，2006 年后贸易增长又开始下降。中国由出口推导的新古典增长导致了中国的经济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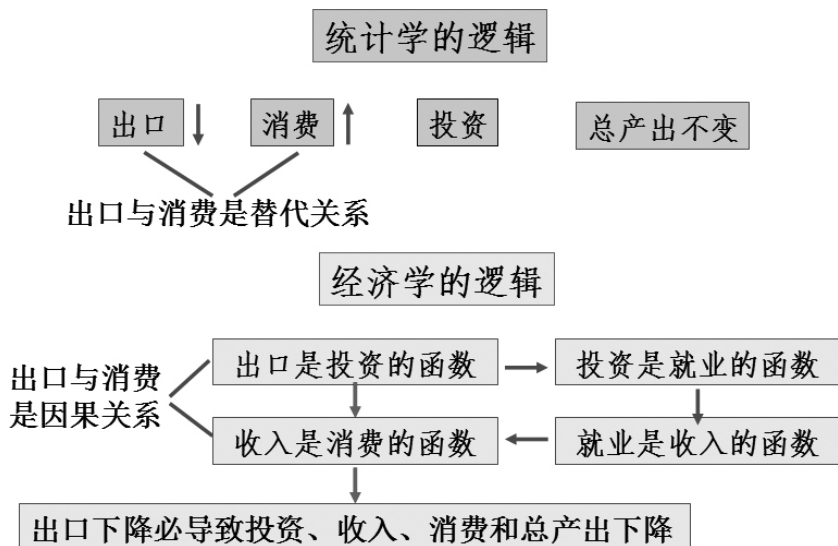


图 20：统计学的逻辑

现在有两种逻辑，一种是统计学的逻辑。我不知为何一夜之间中国所有经济学家成为统计学家，天天讲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出口降下来没关系，消费刺激上去，总产出不变。这是统计学的逻辑，这三样是并列的。但经济学逻辑认为这三样不是并列的：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没有出口就没有投资；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函数系数有多大，要看是资本要素密集还是劳动要素密集；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有

了收入才有消费。中国出口是原因，消费是结果，产生直接传导机制。只要中国把出口搞下去，收入、消费、总产值都会下降，这就是经过学的逻辑。但一夜之间所有经济学家都成为统计学家，天天讲三驾马车，完全搞错了内生的逻辑关系。

1980 年，人民币还在一块五毛对一美元，那时有价无市。慢慢升值，到 1994 年朱镕基调整，人民币贬值 60%-70%。然后，人民币在八块两毛九比美金维持了十年，让中国出现了十年的黄金增长。2005 年开始，我们选择了最不好的中间汇率制，导致汇改后人民币单边升值。按此逻辑，过去十余年人民币单边升值，将来如果出问题了，人民币是单边贬。因为当初的动力是短期资本流动，将来失去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资本便是单边走，单边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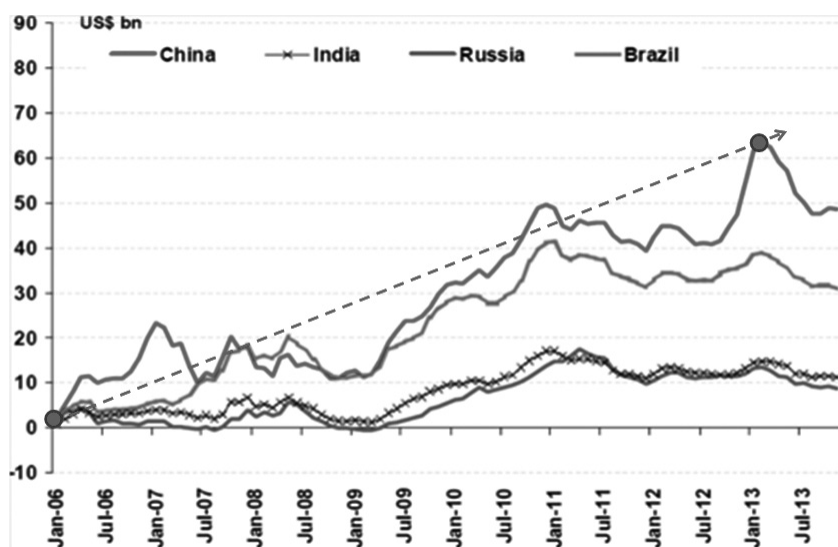


图 21：2005 年人民币汇改后中国的资本流入

从 2005 年开始，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已不是经常项，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速度。2005 年人民币汇改后，远期议价无法消除。2006 年 1 月起，中国的流入资本最多。印度、巴西等国都选择中间汇率制，凡是选择中间汇率制的国家，便是如此。发达国家没有选择中间汇率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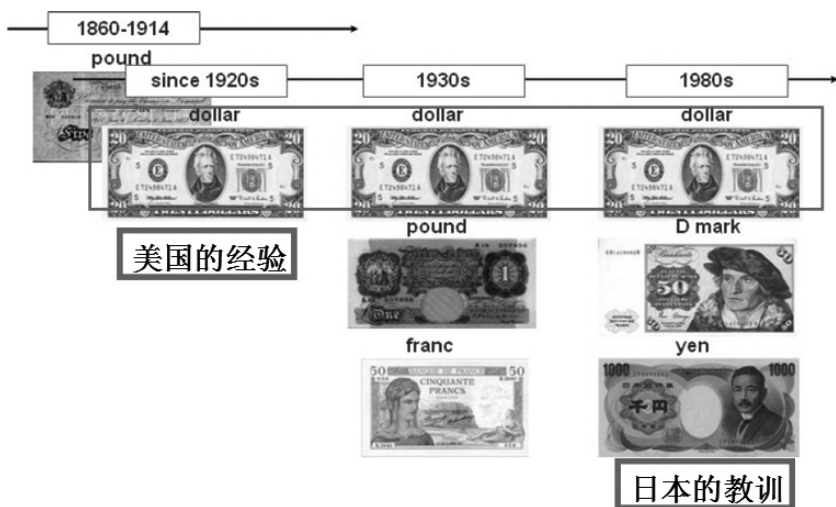


图 22：一国货币能否国际化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可供世界购买的商品或者资产

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个错误选择，即人民币离岸。过去有两件事做错了，一个是价格调整，第二个是结构调整。现在第三件事，我们又让人民币离岸。人民币离岸的目标是什么？是把泛滥的人民币蓄到一个货币池子，还是走强国之路让人民币做世界货币？不知道。从操盘的人来说，显然要找货币池。最高决策者想要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央行操盘的是货币池。2008 年国八条，房地产是一个货币池子；2010 年新国八条，房地产的货币池子没有了，马上重新调整物价，抑制通货膨胀，让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呢？缺乏支持。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国际化，我认为需要两个渠道，一个是商品渠道，一个是资产渠道。

我们来看看国际货币。1860 年至 1914 年，英镑第一、美元第二；1929 年大危机发生，导致 1930 年美元第一、英镑第二、法郎第三；1979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第一，马克第二、日元第三；2001 年以后，只剩下欧元。我们知道马克转换成为欧元，那么日元到哪里去了呢？日本企业全部外逃，全世界不需要用日元来结算，商品渠道不支持。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国际化，首先要向世界提供可供购买的商品。日本逃到中国用人民币结算，逃到美国用美元来结算，逃到欧洲是用欧元来结算，所以日元没有商品。第二为日本泡沫。在日本全盛时期，东京股票上市的外国企业超过 150 家；1989 年资产泡沫之后，15 家都不到。日本国债是 GDP 的 200%，所有外国人不持有，全都是日本国民所有。美国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国际化，第一要具有竞争力的商品，第二要具有资产。

中国有这两个渠道吗？第一，商品渠道不支持。我们在国际市场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不超过十个。大部分中国出口的商品都贴上别人的商标。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当然用美元、欧元结算，所以商品渠道不支持。第二，没有资产。连中国老百姓都买不到资产，拿什么资产供给全世界？中国老百姓买不到资产，就买房产。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买房产么？就是因为没有资产。因此，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缺少基本面支

持，第一没有商品，第二没有资产。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时，如果我们一意孤行，非要把人民币国际化，有可能变成国际空头资产，空头持仓，从而带来远期挤兑风险。用国际金融学的基本原理来讲，一个国家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贸易伙伴，人民币替代美元作为对外贸易结算货币，就是找穷国。

选择什么样的贸易结算货币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贸易伙伴
以人民币替代美元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
其后果可能像500年前的明朝一样（禁海加铜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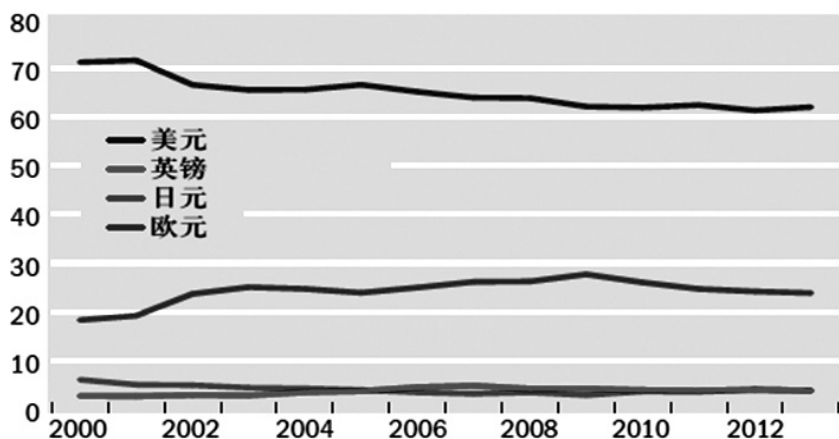
图 23：海上丝绸之路

我这里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的经验。第一件事，1443 年禁海，海上丝绸之路不做了，从此总需求减少了。1495 年欧洲发现新大陆，找到了金币银币，全世界通行银本位，中国却选择铜本位。就像今天用美元作为本位，我国非要用人

民币，退出了国际大网络，从而造成中国 500 年停滞。史书记载，明朝宣布铜本位时，南洋国家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用铜板来进行贸易支付，这种交易成本肯定受不了。禁海和铜本位让中国倒下去了，如今中国又犯同样的错误，内需相当于禁海，我们不用美元却用人民币。如今中国政府做的事和明朝的基本一致，选择人民币离岸绝对是错误。我们很多人没明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用人民币做结算贸易，就可以让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贸易怎么可以成为强国？脱离大市场找的都是穷国，只有他们用人民币交易。世界市场就是一个圈子，你在什么圈子就怎么做。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在过去的十年只出现了些许下降。

(占全球储备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

注：本图仅显示了四大主要储备货币。

图 24：美元的霸权地位未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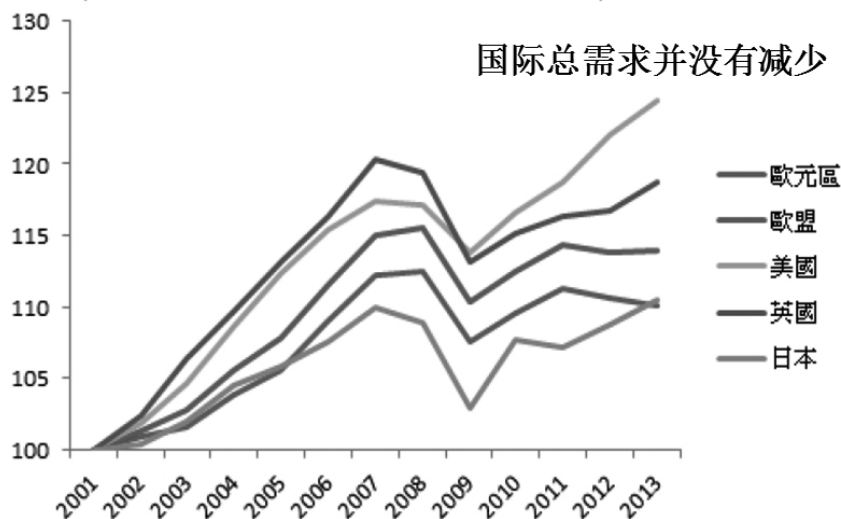
美元是一个网络，我们来看看美元。美元的霸权地位到今天还没变。美元在全球货币主导地位，过去十年只出现些许下降，从 70% 降到 70% 以下，10% 左右的波动。日元和英镑都失去地位，只有欧元可与美元竞争。我们人民币是全球第七大货币，因为没有其它货币，因此与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我不知把人民币推出去究竟想做什么？想对付美元吗？有基本面支持吗？如果不想对付美元，找到货币池子等着被人挤兑；想替代美元，肯定是犯了错误。如果中国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被挤兑。中国经济如何从繁荣走向衰退？错在不做出口，去搞贸易平衡，把整个增长体系全调换了。

最后讲中国如何重返繁荣之路，繁荣之路中有几点。

第一，新常态。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讲新常态了，新常态是有潜在风险的，为什么？新常态下，较低的增长率比上新增就业增长后的“有效增长率”偏低，分子是名义增长率，分母是就业增长率，这两个一比，就是未来十年为什么钻不了空子的原因。大量增长的新增 GDP 被新增就业人口拿走，存量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这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不能接受新常态的。作为一个有人口压力、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潜力如此大，怎可以接受新常态呢？是因为你的政策出了问题。如果真的接受新常态，农村有可能重返马尔萨斯陷阱，城市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上个月去了土耳其，土耳其过去十年从 3500 美金的 GDP 做到现在 11000 美金。我就问土耳其的经济学家，怎么做的？他说两条，学你们中国的。第一要制造，你不干活别想富裕，第二个必须出口，本国人口数量有限。为了防止掉入这两个陷阱，农民数量较多，不出来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一定要发展，就像邓小

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便不会有稳定与和谐。其实，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不是接受新常态，促进经济增长才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发展研究院认为，政府不能做宏观调控，全国实行新常态。我觉得太可怕了，新常态就是两个陷阱，我国在挖这两个陷阱，即城市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农村的马尔萨斯陷阱。新常态的概念是不能接受的，所有的经济学家觉得中国政府做得对。其实，中国经济增长遇到了瓶颈，但找错了瓶颈，经济学家杜撰了一系列的经济瓶颈让中国政府接受了新常态。接下来，先讲外部经济，再说内部经济。

2002 至 2013 年主要成熟經濟體實質 GDP 表現
(以 2001 年末為起點，基數均為 100)



資料來源：Eurostat, BOCHK Research

图 25：2002 至 2013 年主要成熟经济体实质 GDP 表现

常说外部经济贸易环境恶化了，我们看到数据并不支

持。国际总需求并没有减少，国际市场依然在，我们天天说美国不行，但 2010 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曲线完全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水平，绝对没有问题。英国同样恢复到危机以前，欧盟表现稍差，日本在安倍政策下恢复了消费业，但因沉舟侧畔，整体增长水平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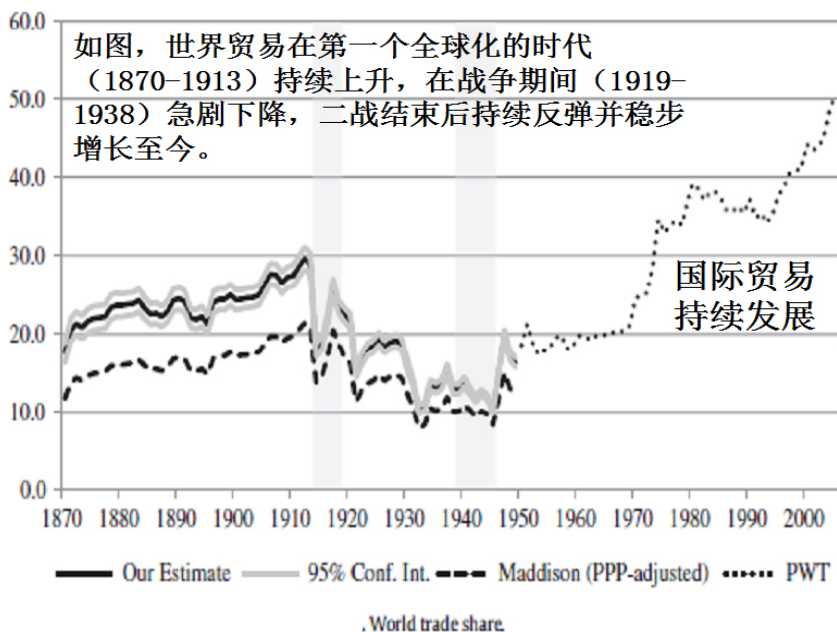


图 26：国际贸易持续发展

国际总需求在减少么？国际贸易环境并未恶化，相反地持续发展。特别是 1900 年以后，从关贸总协定变成 WTO 后，国际贸易没有降下来过，一直在增长。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经济在增长。这里有三种算法，购买力评价、剔除购买力的算法和麦德森算法。现在是美元汇率算法，以前是

购买力评价和剔除购买力评价。第一次全球化结束后又爆发一战，贸易两次下降；到 1945 年二战后第二次全球化起，贸易再未降下过，包括这次。全世界救市都不用贸易保护，都是采取国内政策救市。国际贸易在发展，总需求没有减少，我不知中国的经济学家凭何断定国际贸易环境不佳，我国不能出口。数据不支持。

世界自由贸易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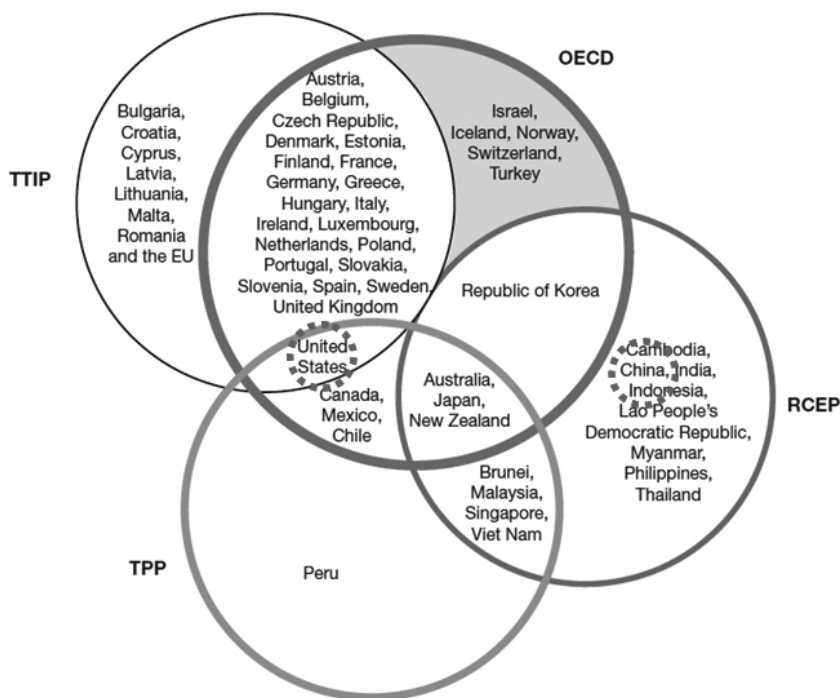


图 29：世界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说中国不能够出口，一定是中国不愿意加入世界

贸易自由协定体系。三大区域，第一为 TPP、第二为大西洋 TTIP、第三为 OECD 和 WTO，美国均加入，中国不愿加入，不愿改革。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并非国际环境不佳，而是自设自由贸易壁垒，不愿贸易自由化。这也是为何上海率先设立自由贸易区，与国际接轨，道理就在这里。因此，经济学家杜撰的第一个瓶颈，即国际贸易环境不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这完全错误。再进行微观分析，所有厂商的产能成本提高，政府开始引导小时工资标准，扭曲劳动力市场，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双双升值。概括而言，全世界贸易自由化继续放大，总需求继续在增长，我国宏观上却不愿贸易自由化。

以上从外部经济来讲。内部经济增长有很多的说法，经济学家杜撰的经济瓶颈，这三个有代表性：一个是人口枯竭，一个是环境恶化，一个是资源短缺。人口红利我们从近代角度来讲，我们复旦人口去年所做的研究，从静态角度，中国农村居民占比仍然很高，47%，而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是 70%，这两个数字一乘，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就基本上算出来。算下来，至少中国还有闲置过剩劳动力两亿到三亿，凭什么说人口红利没有。现在是倒推的。从工资上涨和民工荒倒推出剩余劳动力没有，这个倒推是错的，因为是政府做一个推手把工资涨上去了，依靠新劳动法，把工资上涨和企业招不到员工，倒推来说民工荒，因果关系颠倒了。从动态角度，如果土地制度改革，加上技术进步，让中国小农经济变成现代大农业，农村人口不会超过两三千万。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数据，美国 13 亿人口，800 万农民，耕种 42% 的世界耕地。中国 13.67 亿人口，耕种 7% 的世界耕地，如果中国也花一百年的时间，把产品提高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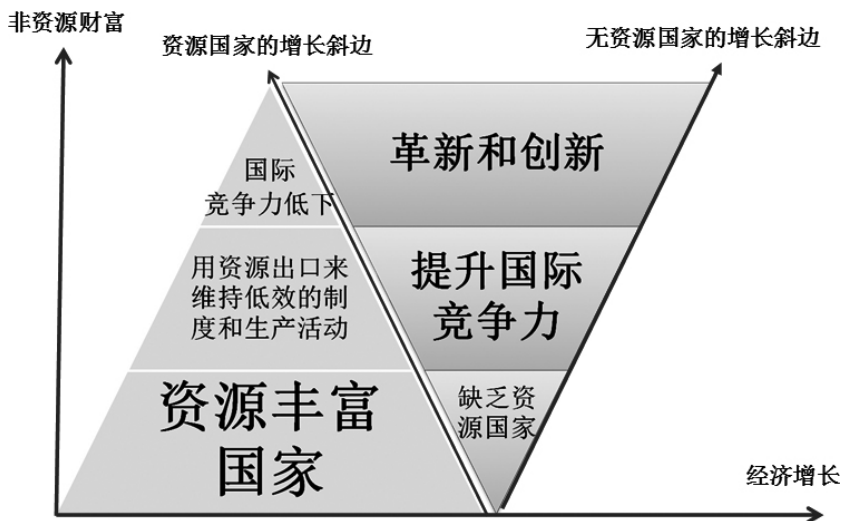
美国一样，如果中国也把劳动生产力五百到五千万农民就够了。你非要人口红利没有了，明明是改革限制人口红利的释放。让城市的工业搞结构提升，结果乡下农民晒着太阳拿补贴，城里人依靠产业结构，大家都在广场跳舞，是很可怕的情景。

第二，环境。中国环境恶化，是政府管而不治造成的，环境是公共品，离不开政府的治理。不能全叫企业买单的，只有一条红线，环境不达标便不准许进场，如果偷偷塞了一点钱，有污染的企业也进场了，就是行贿。放弃管理，实际最后不管不治。很多开发区我跟他们讲你搞一个开发区，关闭有污染的企业，关闭十来家企业，你投资一个环保企业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不能够关闭呢？政府不应纵容污染企业，让 GDP 可以翻一番。环境的成本不能完全让企业来承担，中国环境恶化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管而不治有关。政府本身是在寻租，用环境政策在寻租，发改委造成了多少，都是寻租，然后再治理，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第三，资源短缺。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用缺资源而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相反是倒过来的。资源丰富国家、产油国和产矿国的经济增长线是衰退的。随着资源价格下跌或者资源枯竭，这些国家会变穷。缺乏资源的国家一定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非资源产品，技术、专利、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一定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资源。红色是资源丰富国家的线变，蓝色是缺乏资源国家的线变。缺乏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实现了 50 年的企业化增长。明治维新到 1945 年将近 100 年时间中，日本没有很好实现经济增长，日本想用通过战争的办法来获取，都失败了。1945 年战后老老实实干活，赚到外汇购买资源，

日本经济实现 50 年高速增长，但在泡沫经济后失去了增长机会。

资源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瓶颈



资源价格下跌有利于非资源国不利于资源国

图 28：资源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瓶颈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瓶颈在什么地方？非制度化的市场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让中国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模式变成政府主导的模式。政府主导造成政策对市场选择的替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寻租和腐败，这十年就是前所未有的寻租和腐败。政府对市场的替代，造成政府对产业压制较大：第一是流量禁入，即产业政策，什么行业能做，什么行业不能做；第二是存量挤出，紧缩出口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双双升值。

经济学家天天说资金成本太高，中介交易收费，这些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衰退，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利率高？因为政府在干活。今天中国金融发生的问题五年十年以前就有了，那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最近五年十年增长下降，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呢？因为政府在抢钱，扩张财政。2009年，4万亿财政投资加上35万亿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抢走了市场的钱，把市场利率提高了，结果增长结构变坏了。政府主导企业走出去，那是政府在挤出，货币、就业、产业、出口都变紧缩了，大家就去做金融和地产。现在看不到企业家，满街都是地产商和金融家，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起主导作用，可惜不落实。说是说，做是做，所有政策基本没变，还是在过去遗产的基础上推，还想用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就很有问题。

第三，中国经济重返繁荣的行动纲领。针对前面所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讲的很清楚，我加了一条“振兴出口行动”，因为这是中国所有的窗口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出口，没有投资，没有就业，因果关系已经讲清楚了，这只是制度。对于建设制度性的市场，重新激活市场力量，只要激励机制和价格系统运行良好，基本上所有经济学问题要么自行解决，要么渐渐消失不需要宏观调控。由此可见，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调整，让市场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整会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造成价格扭曲，甚至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负激励。

同时，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解决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贸易非对称性问题以缩小贸易顺差，同时也给与别人挣钱机会，我们也会有更多挣钱机会。自由准入，贸易自由化。但现在上海贸易自由化还做得不够好，我们天天想做金融和

离岸，不做贸易自由化。其实真正应该做的是投资和自由准入，这两个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那么抓手在什么地方？抓手还得依靠振兴出口。第一，只要农民在，就有二元经济结构。振兴出口，尽快回归固定汇率，不让钱逃出去，排除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做贸易。第二，美元离岸，不让人民币离岸，并建立离岸美元债券市场。这就给人民币汇率创造贬值的空间。第三，坚持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我们应该做这三件事来振兴出口。



图 29：贸易决定国家的兴衰

贸易对国家非常重要，简单解读下为何贸易决定国家的兴衰。我们看世界地图。欧亚大陆和新大陆。欧亚旧大陆发展不起来，因为这些地方没有贸易机会，没有出海口。北边是冻港，南边是沙漠，这些地方有人口生活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没有贸易机会。大西洋边上

的西欧，印度洋边上的印度和太平洋边上的中国这三个地方有贸易增长的机会，但没有很好地利用机会。西欧倒利用贸易增长崛起。最终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怎么断代的呢？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把波斯海峡内陆化。原来这里有两个国家，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和降低关税，使得贸易成本急剧下降，丝绸之路也还在。奥斯曼帝国通过控制海峡并进行双方生意，把它内陆化并抽租，使得贸易成本上升，变得十分富有，丝绸之路便断了。中国不做外贸，搞农耕市场了。欧洲就从地中海，经过大西洋，走远洋贸易，这是因为被奥斯曼帝国逼得往那走不了，就往这走。于是，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繁荣起来，先后有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最后荷兰人通过大宗商品贸易交易找到了香料。与马云相同，所有做交易的国家没创造真实财富，只是通过交易渠道，阿里巴巴便没创造真实财富。可是，成为日不落帝国得靠本土制造，英国人便来了，用蒸汽机纺纱织布才创造真正财富。我们每天讲互联网思维，每天讲阿里巴巴思维，阿里巴巴创造了什么吗？真的没创造真实财富。美国人的创新、苹果的创新、微软的创新都是创造真实财富的，这和它们不同。我们只是一个贸易商，一个商人，而非企业家。企业家是什么？通过研发和投资创造真实的产品，比如英国人利用蒸汽机纺纱织布，拿下全球市场。真实财富的运作是有成本费用的，英国通过打通世界上路程最短的一条航道来占领东部市场和全球市场。第一，通过多佛港控制英吉利海峡；第二，进入直布罗陀和地中海；第三，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第四，亚丁湾；第五，通过亚丁湾，拿下印度洋；第六，拿下马六甲，一出马六甲，全球市场都是属于它的，由此成为日不落帝国。通过

历史得出什么结论？谁做贸易谁就崛起，谁不做崛起谁就完蛋。中国这十年拼命要做内需，不做外贸。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
(稀缺性、学习能力
与制度创新能力)

发展教育（回报最大的投资）
投资研发（增加知识存量）
制度创新（财富创造的正向激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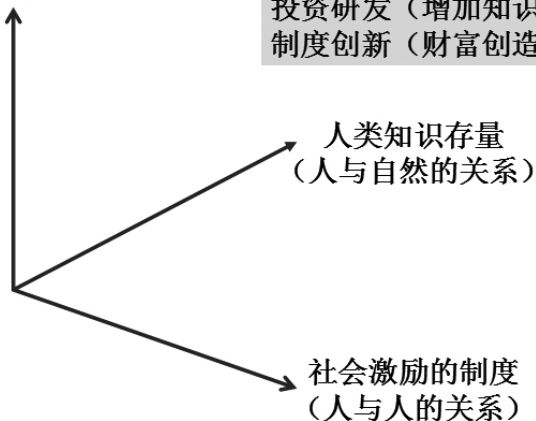


图 30：经济增长三个向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产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通过轰轰烈烈的生产能力创造出一切财富。马克思还讲，资本家奔走于世界，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我们怎么可以不要呢？难道心里所有的经济政策，只是大明的政策吗？大明是汉人统治下中国最糟糕的时代，满清就不说了。现在不要贸易太可怕，不是因为我搞世界经济就说贸易，这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的。短期来讲，我觉得振兴出口，必须要走出去。如果再不这么做，中国真的大势所趋，越做内贸，就越没有竞争；越不参与国际竞争，技术会越差，收入水平越低，整个恶性循环。可仅有这两样不够，这两样是道，还得有术，术是什么？就是进

出口。操作层面得这么做，制度层面是两样东西，对内建设制度性市场，对外进行贸易自由化。抓手是出口。

从来期来讲，经济增长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提高人口质量，现在人口质量太差了；第二，通过研发、增加知识存量、技术创新，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通过改革红利、制度创新和社会激励，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发展教育，回到投资轨道。现在的教育很糟糕，我们投资额度不少，但投下去的钱都没起作用。

两种不同的教育与知识生产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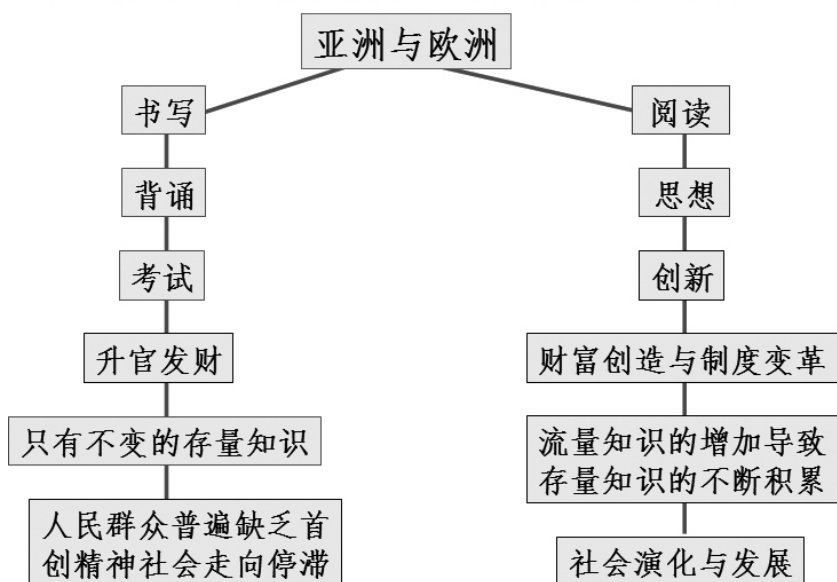


图 31：两种不同的教育与知识生产体系

如果把亚洲和欧洲的教育做比较，会发现亚洲的教育体制很差。亚洲是书写、背诵和考试，目的是升官发财，人们

只有不变的存量知识，普遍缺乏首创精神，社会走向停滞。欧洲或美国的教育是阅读、思想、创新，目的是财富创造与制度变革，流量知识的增加导致存量知识的不断积累，使得社会演化与发展。我们的教育投入了不少钱之后，体系没有建立。教育到底是做什么？如果基本上是行为规范，不是知识传送和人力资本创造，那么这个教育体系很糟糕。

知识存量与社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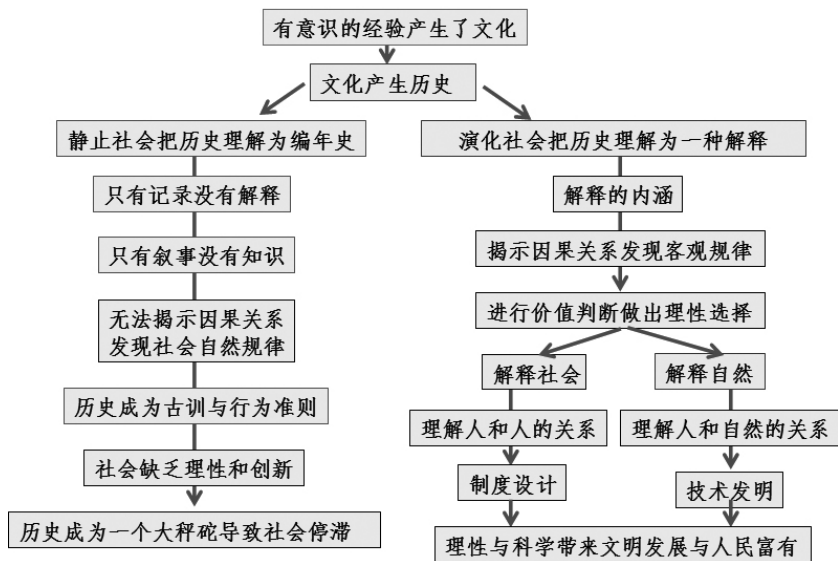


图 32：知识存量与社会发展

我国大学质量差，创新分布和存量知识都很糟糕。因为基本上是行为规范，告诉你怎样孝敬父母，告诉你怎么做好道德与人生，从来不告诉你怎样创造财富。今天中国凡出国的留学生，读三个专业，第一个金融，第二个法律，

第三个工商管理。就学这三个，没学物理和技术的，这样知识存量是不够的。没有人去学如何创造财富，我们所有中国人在学的都是如何去占有，而不是如何去创造。这是教育的本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期来讲，中国经济转型成发达国家很难。我们所有的论坛，到处都是告诉你怎么一夜造富，互联网造富，金融造富，而不是我要去创造财富。中国大学有问题。

大学的功能是生产流量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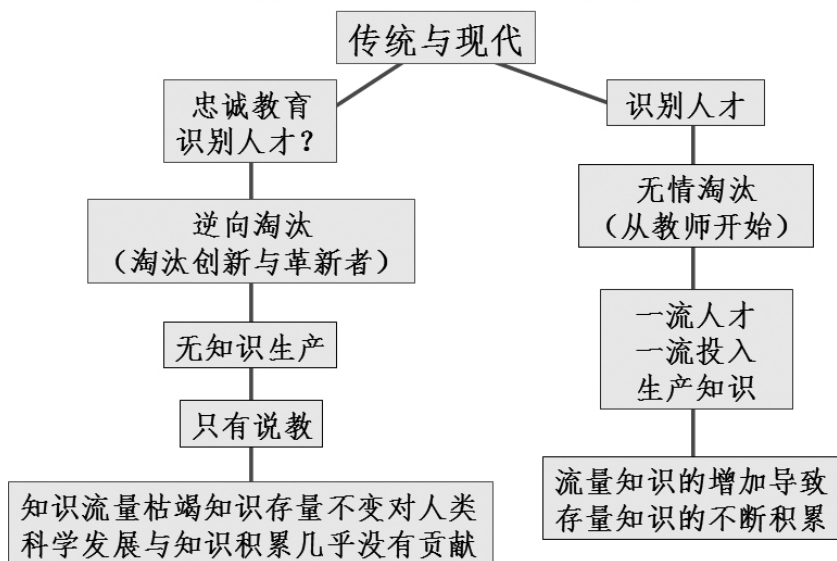


图 33：大学的功能是生产流量知识

最后一点，长期来讲，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忽略，就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吗？中国千万不要去争夺世界霸权。我们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很强势，不好好改革自己的社

会，会出现问题。我们用黑洞理论说明。黑洞爆炸，一个星球体系形成了，能量消耗完毕，又形成一个黑洞。黑洞再爆炸，又产生新的星球体系。宇宙是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上的创新（地区分布）
Innovations in History By 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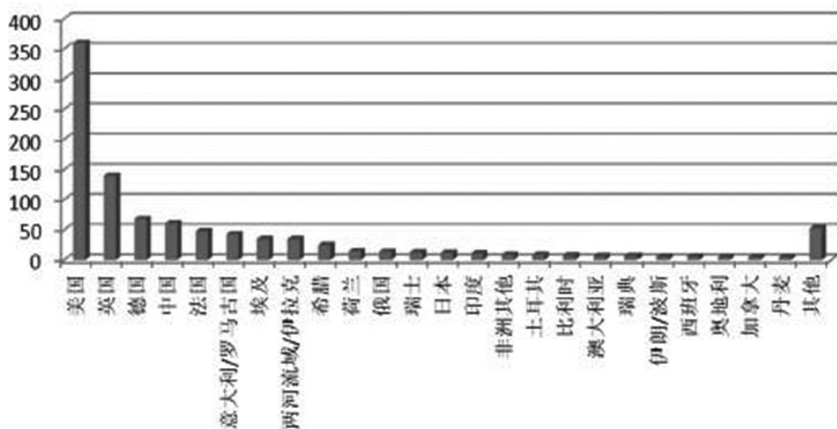


图 34：人类历史上的创新（地区分布）

从农耕时代到现在，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三大经济体。第一个崛起的是中国。农耕农业时代，中国 GDP 在全球经济中占比最高，农耕时代全球劳动生产率相似，中国依靠人口规模取胜。但中国在全球体系是朝贡体系。只要你跪下称臣，你喊我一声爹，我什么都给你。根本不计成本，不讲效率，这是朝贡体系。今天中国又搞这套，红地毯一走，四亿美金给你，二十亿美金给你，完全没有世界观，没有人权和产权这些概念。所以，中国很快进入黑洞，经济负增长。

人类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地区分布） Science Contributions in History By 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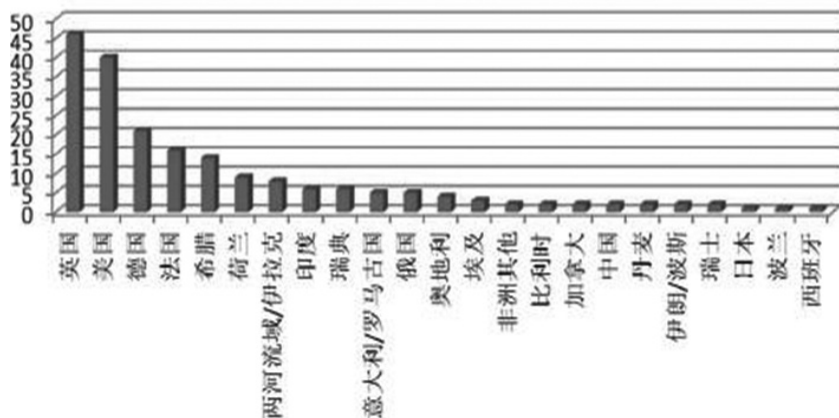


图 35：人类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地区分布）

第二个崛起的是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人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大国，但从未提供国际公共品，并推行殖民主义来获取世界市场与资源，从而产生为负的外部性。英国产生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它富有了，但可能产生零和效应。资金走掉了，英国殖民走掉了，成为黑洞。

第三个崛起的是美国。美国依靠创新成为世界主导国家，从早期的门户开放政策到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公共品生产，具有为正的外部性。美国的道德基础是人权，只有在你能自由呼吸的时候，才能有创新。所以靠创新、人权与提供公共品，创造了一体化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中国要以自己的朝贡体系，与美国的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竞争，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所有的意识形态中，没有世界观，对世界的理解完全错误，哪里还读懂了世界经济体

系？读不懂中国自己，也读不懂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往哪里增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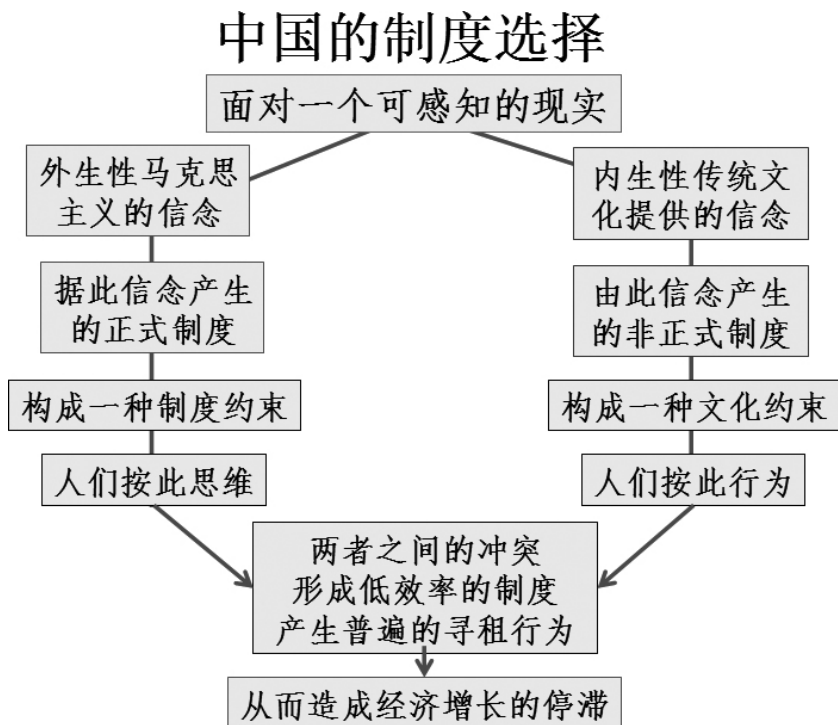


图 36：中国的制度选择

短期是让中国经济重返繁荣之路，中长期要解决以上问题，特别是如何重新回归世界经济体系、和平崛起。

邓小平说接轨，我们现在说替代。现在军工股居然会爆炸，资源配置大规模向军工系统转移。我国可能吗？二十多年创造的财富就这样被慢慢消耗，市场没有了，财富没有了，每天要么送给别人，要么送到军工系统里去，这样的资

源配置太可怕。全中国人在玩微信，读国学，传播消息，崇拜老祖宗，长此以往，中国会彻底完蛋。中国要真正地走向繁荣，必须要符合小平所讲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世界接轨”。我就讲这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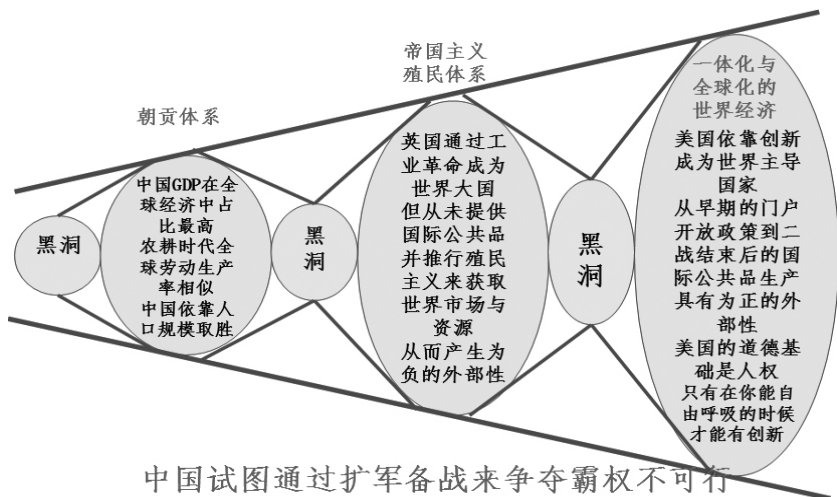


图 37：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吗？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非常感谢华民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演讲。我们三四年前也谈过一次。在杭州的时候，因为时间来不及，有一些比较大的长期的东西没有时间谈。今天他从比较小的内容开始讲，特别是对于过去十年政策的评价，可能不是非常正面，有很多批评。一直讲到以后怎么重走繁荣之路，讲到从道和术两个方面，道是深化体制制度改革，

术是加速出口振兴。振兴出口是一个抓手，一直到长远知识结构、体制、和平崛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从具体的小的一面讲到大的，讲的较全面。下面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些发言，可以提问题，也可以做一些评论。同意的不同意的观点，我们大家都可以随便聊聊。

费方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题目讲的真是不错。他是按照自己的独立研究，讲的自己独创的一些东西。你里面提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真的可以一个一个讨论的。比如关于你里面几个敏感问题，一个出口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出口是成功的，你也讲了成功的原因。还有你讲到了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的问题，这也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关于定价的问题，价格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当然你还可以做很多东西。但至少有一条，你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立研究，并且你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系统化的。现在能够做这样一种系统化的独立研究，很少见。因为大家都是从发表文章的角度，找点数据弄点东西就发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具体讨论。比如你讲到出口的问题，说的很有意思。你说丝绸之路怎么冻结了，这个很有故事性。

华民：因为我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一个礼拜。

费方域：我们现在提两条路，海上或者是陆上。我前段时间到宁夏去，他们给我出的题目叫“区域经济和金融改革”，题目很大。在现在的新体制下，央行、银监会那些司长兼职、挂职到那个地方，到金融办当主任、副主任。他们让我去讲，我对银川也不熟悉，我就看了一点东西。我特地早去了一天，跟他们几位领导聊了聊。现在国务院在宁夏批了一个内陆开放的试验区。因为我要讲区域经济，我就想，

你搞区域开放，举着它原来是丝绸之路的旗，但我看它跟丝绸之路沾不上边。

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内陆开放怎么搞。要振兴宁夏，要搞内陆开放，具体怎么搞法？

首先，我有煤，我就想应当把煤怎么样气化、液化，搞煤经济。第二，我有枸杞子，枸杞子可以加工成宁夏枸杞。第三，我有葡萄。我觉得这个葡萄就很好。

这个思路就是利用本地资源。我没有像你这样上升到理论上。

我就很直观地说，现在是搞内陆开发，应该首先想想沿海开放。沿海开放，第一个问题是沿海这些城市也没有什么资源。你说浙江有什么资源，你说广东有什么资源？没有资源。你说过去的晋商，也没有什么资源。你说美国和英国，也没有资源。你说资源是一个想法，但你既然要开放，你就不能局限于此。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我说现在你搞开放，你根本就没有开放的思路，你也没有开放的经验，你也没有这个人才。那么这些东西，沿海都有了，你把沿海这类东西搬过来就行了，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会儿跟你讨论，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命题，就是关于过剩产能的问题，这个可以讨论。现在客观上有了产能过剩。沿海这部分的过剩产能，你把往阿拉伯国家搬。在那些地方，你可以用这个来换它的主权基金，换它的其他东西，只要把这块打通。这也就是你所说的贸易。

刚刚你提到了很有意思的问题。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该淘汰的，你就把它淘汰掉。第二种不该淘汰的，那么你的市场应该是面向全球的。如果面向全球的话，现在我们所谓

的过剩里面，也应该包含两块，应该把不行的一块灭掉。

华民：政府做出来的肯定是产能过剩，市场做出来的肯定不是产能过剩。

费方域：一块你有本事把它灭掉，灭不掉它是有问题的。第二块你把它弄出去，比如说东部过剩了，西部不一定过剩，西部过剩了，不一定全世界过剩。这两块按照生产率来说，生产率没有优势的，就应该把它灭掉，灭不掉它就说明你整个的制度有问题。第二块是应该出去的，你如果不能够让它走出去，就说明你的政策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关于消费和投资的问题。你里面讲的储蓄的问题我不太懂。你提到了两个缺口。

华民：储蓄问题就是低收入发展国家居民没有存款，按照后来的一种说法叫金融压抑。一个是收入水平造成的，因为穷而没有储蓄；另一个是因为低利率而没人储蓄。我们中国 1979 年改革开放面临第一个问题是穷，没有储蓄。

费方域：我现在知道了。我们原来跟林毅夫讨论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停留在以投资作为支撑的层面上。

现在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认为，投资上不去是因为投资是过剩的，为什么？过剩说明投资太多，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太少。所以说应当多出去投资，但投资不出去怎么办？短期来看，应当促进居民消费。消费又产生一个问题，消费到底可不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消费本身是不是可以短时期内拉上去。

实际上我们一做就知道，最后回过头来还是要投资。只是说过去是进行一些城镇化的投资，现在是对铁路投资，投资一些早晚要做的事，像港口投资。在实际操作中，在短时间里面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投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事

情到底怎么看？

一个方面我们投资不行，为什么？因为过剩。你现在投资的边际太低了，但实际上的运作又上不去。要保 7.5 实际上肯定保得到，但问题是这是有成本的，成本就是下面的地方负担。将来你收回这个又很难。

至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消费这块，我们现在弄哪里去？投资这块又甩不开，明明知道它有问题，也甩不开。这个问题怎么办？

第二个，你那里有两个说法，我觉得蛮有启发的。一个是关于农村人口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个学生找一些数字，包括前面一块和后面一块。因为农村的转移是不断在发生。发生以后，如果能够解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块问题。

还有一块是结构问题。服务业和产业，产业这块，你有很精辟的，很有意思的关于中等收入的讲解。因为制造业的发展，造成这个阶层很难形成。

社科院专门搞了一个课题，研究中等收入。你可以跟他们要来看看，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专门有一个所，来做这块东西，什么数据都有，中等收入有关的数据他们都收集了，采集的数据很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服务化这块，农业这块。对于先进制造业这块，到底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战略位置上来考虑。刚才你在解释这个缺口的时候，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就是关于汇率问题。汇率问题也是两个，一个问题，比如说前两天讨论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十三五规划也提到了，那应当做什么呢？围绕国际做就是要开账户，要开账户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浮动汇率。矛盾在哪里？我们

当下要鼓励贸易，这样的话，需要的又是固定汇率，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矛盾。如何取舍？怎么办？

乔依德：资本账户开的慢一点。

费方域：实际上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实力，完全没有问题的。

李麟（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调子现在都有点变。

费方域：还有一个就是自贸区。实际上刚刚那张图有几个重叠。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搞自贸区，实际上自贸区真正的起因就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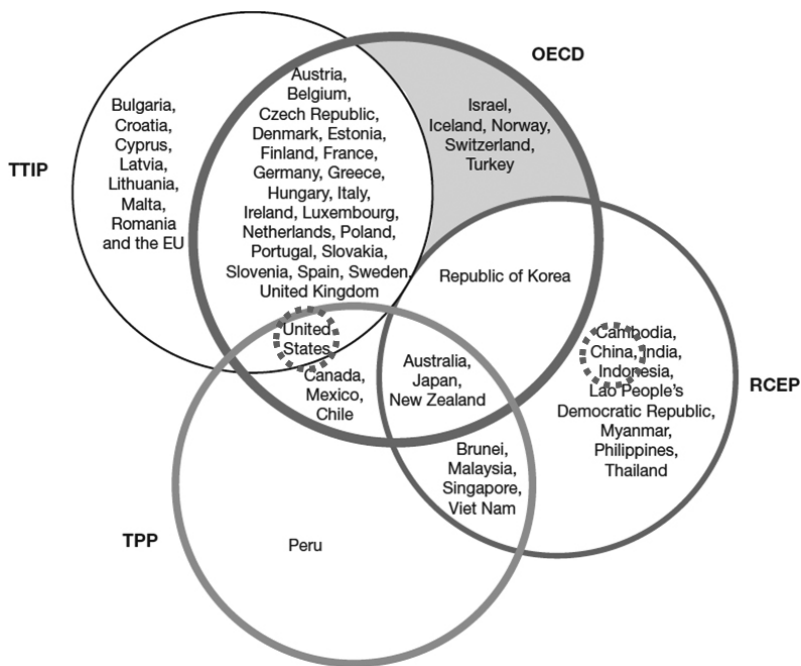


图 29：世界自由贸易协定

华民：我们现在还在局外。

费方域：你刚刚讲两块，一块是贸易的问题。现在第二块，投资比贸易更重要。因为跨国公司的存在，它的业务量中，投资的量超过贸易的量。这样的话，整个世界贸易和投资中，双边投资和多边投资就成为了主角。这样的话，TPP 和 TTIP 这块就至关重要。如果你不进去，人家就这么定了，人家不跟你玩。

华民：人家零关税，你 7% 的关税，人家有准入，你没准入。

费方域：要么你同意，要么你不同意，与其这样我们和他们一起谈。本来自贸区一个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来说，我认为这是对的。

华民：自贸区的决策是对的。

费方域：问题是做着做着把这个意义放下来了，本来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搞成了负面清单，搞成各个省之间可推广可复制。这才是真正的战略重点。

华民：把它降到负面清单就不对了。关键你是要入局，要进入到全球自由贸易大局的体系中。

费方域：这个自由化你不去，就吃大亏了。

乔依德：我来谈谈，因为华民差不多每个问题基本上全部涉及到。我大概归纳一下，每个问题怎么来判断。还有你讲的有些事实有一些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出口，我感觉上，好像现在没有说不鼓励出口，退税力度还是加大的，虽然没有像刚开放时那么显著，但实际上还是鼓励出口的。我觉得还需要再分析这个事实。我特别想讲的，你最后在杭州没讲的那块，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军工，军工股现在是上升得很好，这是很糟糕的。

华民：今年股票军工股平均上涨 72%。

乔依德：这是很糟糕的现象。当然你用黑洞的理念来解释也很有趣，我觉得不需要用黑洞来解释。我以前跟很多人这样讲过，我两三年前有这样的观点，我现在还是继续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出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外交，第二个是社会包括政治，第三个才是经济。不是说经济没问题，经济不会爆发式地出现问题，而是慢慢的一个东西。外交是不可预测的，你哪天擦枪失火马上就垮下来。日本不好，中国也未必好，大家都不好。这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讲难听一点，有时是有这样的苗头，不但网民有这种想法，包括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有些人的文章也有这种问题。我讲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现在发展是不是第一要务？我们所有党的文件都再三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你就很清楚要围绕着这个来，其他对发展没有好处的就别做。这是很简单的事实。

我们国家比较容易好大喜功，比较容易说大的。大国有大国的好处，大国也有大国的毛病。小国的国民容易幸福，紧巴巴的钱都用在居民身上。大国的钱容易集中，集中了搞大的东西，有好处，但搞不好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我们现在搞那么多的孔子学院，花那么多钱。你教人家学汉语，到最后花的钱有什么回报？你学两个汉字，中国的软实力就增加了？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老实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社会上有一种思潮觉得我们很好了。你刚才讲的我也特别同意。现在也不太提跟国际接轨了，因为我们自己是最好的了，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大的问题。这块我也基本上同意，我也是很担心的。我上次在浦东讲，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00 年，甲午战争 120 年，尽管有很多老生常谈的文章，但其中一些东西也不是老生常

谈。英国出了两本书，提出第一次大战的发动一开始并不是有意的。很多人以为战争很快结束，没有人想到是那么长。德国兴起，跟人家最后打起来了。甲午战争，以前总是说落后要挨打，这次的总结还好一点，也有说是内部自己的政治的问题。还有一条，为什么日本跟你打？因为那时你的朝贡体系中，朝鲜是整个朝贡体系最后剩下的一个藩国，其他如越南都离开了。日本打的旗号是要让朝鲜独立。你现在做事情不要给人家借口，这也很重要。以前我们总是不讲这个事情，最近你仔细看，有些学者也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费方域：讲历史不实事求是总是个事。

乔依德：出口是很重要的，正如我刚才所讲，现在还是强调出口的。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你的数据，从国际全球总需求来看，从 100 到 120 还是有增长，虽然这个增长跟以往相比有所下降，但总的是在增长，这个不错。以前我们出口都是 20-30%。金融危机以后，基本上是 10% 以下。基本上是这样的。

费方域：这里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我们不鼓励出口。第二个概念，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了。他刚刚讲的是需求还在，你的出口下来是不对的。这个话，我认为他讲对了一半，现在不是没有需求出口出不去了，现在是亚洲其他国家比我们的成本更低。

华民：工资和汇率转到这个地方，能做的只是这个东西，所以人家挤进来，把你挤出来。

乔依德：我们工资是增长，但工资增长是不是完全由于劳动法或最低工资使得我们工资增长？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因为有的时候你是没办法的，经济增长到一定的时候，工资总是要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的悖论，任何国家都会有。

费方域：你整个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到了应该是升级的时候，但现在升不上去。

华民：因为你汇率涨了，工资也涨了，必须往上走。

费方域：应该走上去，但实际不行。

乔依德：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这是我的判断。老实说，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但工资增长并不是因为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在增长，总归不大可能让你工资不增长，整个社会的职工都得维持。

费方域：关键我们原来出口的那部分东西，现在被其他国家的出口替代了，其他国家比我们的成本更低。我们当年做的事，现在别人接过去了。我们又没有新的出来，老的被人替代过去了，我们出口部门受到的压力就很大。再加上你说的，我们把成本再一提，这样的压力就更大。客观的结果，看上去政策不鼓励出口，实际上你再鼓励，出口这块也缺掉了。

乔依德：这其中原因很多。我再补充一下，你讲的是对的，这个事情我想了很多。出口投资这样一个连环，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你的分析是对的，但跟三驾马车不矛盾，统计就是这三块，根据核算表。当期确实是这样的。

但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就是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回到三十年以前，我在世经所时，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当时有很多辩论。有一个说法，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中国能不能做？很多人不赞成。但实际中国是能做的。

费方域：当时的四小龙，相当于现在的中国。

乔依德：其实你还可以加一条，除了出口以外，引进外

资还是要的。当然这个引进不一定是加工贸易的引进，还有技术、服务。我同意你讲的，这些方面没有开放，这方面还要继续开放。

华民：服务业开放会进来很多服务。技术服务也会进来很多。

乔依德：我前两天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金融论坛 IFF，有关国际金融。我们后来也组织一个关起门来的会谈，大概十个人。也有人就提出来，到底为什么要人民币国际化？上海为什么不支持搞在岸，要搞离岸？因为你在岸容易控制？

费方域：没人说不搞在岸。

乔依德：刚开始就是搞离岸，不搞在岸。

费方域：你去看看周小川的发言。

乔依德：我知道你讲的，但上海怎么做在岸？在岸是空的。博鳌论坛时，我当面问很多人，他们怎么回答的？有了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离岸就是上海的。实际上都是空的。

费方域：自贸区就是两条渠道，一个是中银这个渠道，还有银行代理。

乔依德：这个事情包括人民币走出去，从道理上，我想你也同意的。让外国企业过来，从道理上是这么考虑的，外国企业来了，资金来了。

费方域：我感觉央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想比较快。后来，与余永定几个谈了以后，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原来计划太快，所以后来才往回收，包括自贸区的提法往回收。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这个时候要么干脆市场化，不然的话，我估计不会轻易再动。

乔依德：其实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五道口论坛上，去

年我在陆家嘴也说了这个意思，我不同意盛松成最后的文章，资本账户开放不要因为外面的短期波动而受阻碍。我的观点是 QE 退出，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不清楚。去年五月份刚刚一宣布要退出，印度印尼的资本大量外逃，汇率下降很厉害，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傻兮兮做这个干吗？

费方域：问题是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一点点做。

乔依德：没法总量控制。

华民：给谁开放，给谁不开放呢？

费方域：沪港有总量，比如说前海也是有一个总量的。

华民：那边进去是港股市场，这边进来是封闭市场。如果你放开资本项，你都不知道它的钱出去干吗，你怎么控制？

费方域：先小部分开放。

乔依德：这个可以，我觉得今年和明年都不用很着急。因为利率市场化，汇率，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还是可以继续做。把深度、广度、债券市场，很多东西抓紧做，然后再看看。何必这么着急呢？

华民：现在资本项开放，你到底是先解决价格扭曲的问题，资源扭曲配置的问题，还是想要去购买好的资产，让好的资产来到把钱留在中国？

李麟：我有几个观点。第一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争论，就是金融改革和贸易哪个优先的问题。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金改就优先；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贸易优先。这个事情我确实看了一些研究材料，比如说德国，德国当时推这个事情也是处在贸易还是金改先行，产品贸易的竞争力为第一位是最终的决策。

结合当前的情况，华民老师的这个材料，我觉得非常

好，正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实际上都是要兼顾的。

在推金改的时候，利率市场化，还有目前产能过剩的出国处理，这是一个体系。不能光顾金改这方面，就忽视实体经济出口这方面，其实这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现在的改革有点不管不顾。

特别是汇率的改革，必须要兼顾当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如果不关注这个的话，只能是对当前的经济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世界公认德国处理的比较好，第一产品竞争力没受影响，贸易没受影响，第二个后面的汇改、金改衔接比较好。台湾和日本，就没德国那么完善，一方面落后产能出了国，另外一个方面是产业空心化，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落后产能出不去，第二是这两个次序的问题，现在齐头并进在推，贸易也推，金改也要推，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第二个体会，我觉得华老师的观点跟新常态是一种补充。新常态不等于不增长，新常态不等于不作为。这里面的重点是，我们和发达经济体有一个差异。这里面华老师讲的很清楚，我们有结构性问题。新常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增长常态到另外一个增长常态的回落，但中间有很多过渡的问题。我们的新常态跟发达经济体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市场机制的新常态，我们现在是结构的老常态，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还有增长的新常态。接下来我们要调到什么？我们把贸易、金改调顺，中间就是结构的新常态、增长的新常态，最后就是体制新常态，就跟他们一样。

我听得仔细，回去再做功课，这听起来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且这个结构问题理顺的话，我们会比美日欧发展得

更好。

华民：我补充一点，大陆国家通常比日本、英国这样的小国，实际上可持续的时间长，比如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其可持续的时间很长。

李麟：纵深长。

华民：结构调整到位，可持续增长的时间可以很长。

李麟：这是第二个体会，这有可能是新常态有共同点。

第三个是主要动力转换的补充。我们第一次是在 WTO，WTO 时代是出口导向，出口是第一个主动力，投资是次要的。但现在的情况，这两个有一个转换，是一样大呢，还是出口更大？这里面有哪个是主动力的问题。当然这个主动力，我觉得它里面也有派生。投资大，也可以有利于促进产出；出口多了，也可以拉动进一步的投资。但这两个动力的转换实际上是 GDP 形成机制的过程，主因素的变革。我听了华老师讲座最大的体会，是确实不能一家之言，要兼听则明，出口和投资的动力的转换是有条件的、有阶段的。

所以要真正把中国的经济，从新常态增大，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但结构转型里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想保出口，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实际上我们想保出口，我们想加入 TPP，但人家不开放，美国不要你。我们要改革，我们要改金融，但国内好像就是专门要改进，忽视了主动力。从华老师的文章出来，我们更加坚定全球的需求拉动，依然是我们改革的动力，以前是产品走向世界，现在是人民币要走向世界，要便利化，还有服务业也要走向世界。如果有世界的需求拉动，也是出口导向型的。

乔依德：我恐怕华老师不一定会同意，人民币走出去不一定就是出口导向。

李麟：以前产品周期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华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是互补型结构，现在是制造业中心，产品要出去，人家服务要进来。那么在三产中，只有中间的第二产业是一个拉动力。如果服务业变强，对内开放，全球接轨，按 TPP 的规则，我们服务也可以走出去，我们服务出去就多了一极。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政策跟您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另外对于丝绸之路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也受您影响。

实际上，在美欧国家好像是我们出口受阻，因为 TIPP 和 TPP 规则，加大了对我们贸易的制裁量，国企这方面考虑很多。实际上我们想再开一个偏门，就是在传统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之外，在丝绸之路再找到一个输出产品的门路。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出口导向，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华民：在中国有一个问题，领导那么想，底下执行的政策都是你那样的思想。我一个月前去连云港，连云港出口加工区的管理人员，还有企业都恨死了政府。为什么？因为自从一带一路下来以后，不准他们进入欧美市场，一定要让他们把东西往西走。底下都这么干，只要党中央下一个号召，一定这么做。他们所有商品往西走就亏，因为运费上去了，往欧美市场走就挣钱。现在开发区搞好了，企业就是招不进来，不办出口单子让商品往西走干什么？连云港就这样陷入僵局。

李麟：连云港是一带一路的交界点。

华民：一带一路所有商品让往西走。

乔依德：我同意，包括改革，一方面三中全会讲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国务院开了很多会，包括审批减

少、年检取消。我也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他说不管怎么说，这给我减少了一些负担，年检不像以前，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职能还在弄。有一个朋友，全国政协的，到广东广西考察，他说跟当地领导讲话到最后，几乎只有一次提到发展民营经济，其他都是跟着中央走，发展丝绸之路。最后他们都希望中央政府给支持，来做这个一带一路。

李麟：现在道路是有点弯，所以一定要校正，不让企业往欧洲市场走，实际上对经济市场是阻力。

华民：不让你出关，非要沿着那条路走，统计数字显示通过龙口线出口上升了，如果那边没有货过去就背离中央精神，海关报关也没有地方报。

李麟：第四个启发。我们现在国内谈论的还是 GDP，出口和金改处理最好的是德国，日本是一个畸形，日本这个我没想清楚。但我发现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 GDP 导向，日本已经是 GNP 导向，所以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空心化？但是从全球的资金 GNP 导向来看，它是成本最低的。

华民：比较日本和中国，一个 GNP 导向和 GDP 导向，两个国家区别在什么地方？日本 GNP 导向，马上就产业空心化，年轻人没有就业收入，年轻人是穷的，，但 GDP 是留在国内。

李麟：但日本的年轻人感觉很幸福，没有压力，游学，打短时工。中国年轻人压力很大，买房，这就是 GDP 导向的问题。

华民：因为现在日本老年人很有钱，日本年轻人没钱。

李麟：但日本的年轻人的幸福感比中国年轻人的幸福感强。

第五个军事。我理解它是保资源保税收，如果绝对是为了单纯建立一种帝国式的，我觉得跟这个主线是不符的。我觉得您这个观点非常好，跟其他的互补起来，可以促进大家形成对问题的正确认识。历来都是保商品，保贸易，不是政治上的，最后的核心利益都是真正的指南。

第六个体会，国际规则和自己规则的问题。最新规则不是讲利率什么的，就是双方对内的开放规则。其实我觉得，不是咱不想融入到这个贸易体系，关键是人家不带我们玩，我们被迫不得不拉小圈子，我是这样认为的。

华民：这个有点一个比方，我们在上海生活，农民进城卖菜都是马路边上卖，不进场，因为进场要付成本。我们现在不进场，要加入到 TPP 就要市场开放，我们现在付不起这个钱，所以就被人家堵在门外。在门外我们也找门外汉，门外卖给门外。

李麟：我在门外拉一帮人自建市场，跟你对着干。

华民：我们不在政府的菜市场里弄。但你长期弄下去机会就少了。

李麟：但这是渐进的。三个规则，一个规则就是最近的，最新的，互惠的这种规则；第二个就是双边的规则，两家谈好就行；第三个是国际性的，TPP 和 TTIP 这是影响最大的。如果这是我们战略策略，我们赢不了这个，我们可以选择二三条战线，但只有到第二条战线才可以跟第一条战线谈，谈的对象好一点。

华民：就怕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小圈子做法，人家认为你是一伙的。就把你定性了。本来是数量的问题，我要让这条曲线平滑，我先做一点准备，但人家给你贴上了标签你就完了，贴上标签你的谈判成本更高了。

肖明智：听华老师讲座很系统很受益。我有两点感想，第一您一开始提到了工资增长，我觉得工资增长前面几十年是因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确实很大，这样带来的工资增长没有问题。现在劳动力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速度减速了，之前的工资增长是不是有一种惯性所以工资增长快于 GDP 的增长，这样就损坏了积极性，特别是制造业。

华民：对。

肖明智：对于出口的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出口国，出口减速，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总量上的原因。2014 年中国的出口有接近 8% 的增长，还是快于全球总出口的增长。

乔依德：我查了一下，1980 年，出口占全球 0.9%，现在在大概 9%，增长十倍。所以比例不可能永远在增加，总归要回归自然，不可能推到极端，出口占全球 20% 是很难的。

肖明智：中国本身已经高于全球的增速，它的份额一直是在抢别人的份额，这是一个方面。

您讲到的日本跟德国的例子，很深刻，但还有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那边并不完全是靠出口，它也靠投资。依据凯恩斯的那套理论，中国虽然产能过剩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就不投到生产性资本上，投到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上，依靠地方政府，当然也会有地方融资平台一些问题。但现在有两个方式可以解决，一个是 PPP 的模式。另外一个就是做地方资产负债表，地方的资产负债表对外透明了以后，是不是可以通过中介机构进行地方的发债，解决债务恶化的问题？因为做基础设施的话，这种再形成的资产，通过 PPP 或者是资本市场来融资的话，债务问题不会特别大。

这样，把基础设施做好以后，会对经济有比较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除了出口这块，投资这块是不是也可以有促进的作用？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受益的地方需要慢慢消化。

华民：政府靠投资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多的好处，也有很多的局限。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资产负债表怎么平衡，这是我始终担心的问题。

李麟：而且现在民企。

华民：上次魏尚进讲铁公鸡和实际汇率，我看了之后，觉得他讲的很对，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政府投资，要平衡资产负债表就必须收费。生产的东西，本来是公共品，可以降低汇率，但不收费地方政府所有项目的资产负债表怎么平衡？面临两难，要么收费，收费很多人选择不进入，对于降低实际汇率没有很大的作用。它的边界值在什么地方？

美国人、欧洲人也不傻，为什么不投资基础设施？美国的基础设施很老化，欧洲很多国家也都不行，除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的交通设施还可以，其他的国家都不行了，为什么他们不投？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乔依德：我在其他的场合讲过，两三年前，芝加哥大学的 Austan Goolsbee，这个人担任过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工作两年因为不能离开学校太远，他又重新回到学校。我们在一起在北京参加会议，我跟他在那儿聊天，他就问我高铁上海到南京多长时间，到北京多长时间。我小时候祖父祖母在南京，那个时候上海到南京快车七个小时，慢车十几个小时，现在只有两三个小时。他说很好。我就问他，那个时候我刚去过美国，波士顿铁路那么烂，为什么不弄？他跟我讲，第一是土地的成本太高了，现在土地都已经私有，重新再弄，

这个价格不得了。在原来的线路上改？他说不行，因为现在是高速的，原来弯弯曲曲的轨道不行，一定要拉直，不能弯很多，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部分解释了难做的原因。

李麟：还是成本。

乔依德：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政治，有很多牵制，还有预算等等，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华民：法律不一样。介入成本也高。

乔依德：这估计也是一个原因。我们都是国家把地拿过来，比较容易。他们那里土地价格很高很难弄。比如日本的机场里，最后还剩下一家不能动迁，他如果不动政府就没办法。这也是两个极端。

今天一直谈了三个多小时。华老师涉及的面很系统很广泛，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出口、汇率等等，有些东西需要慢慢再消化，再整理得清楚一点。谢谢华老师。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